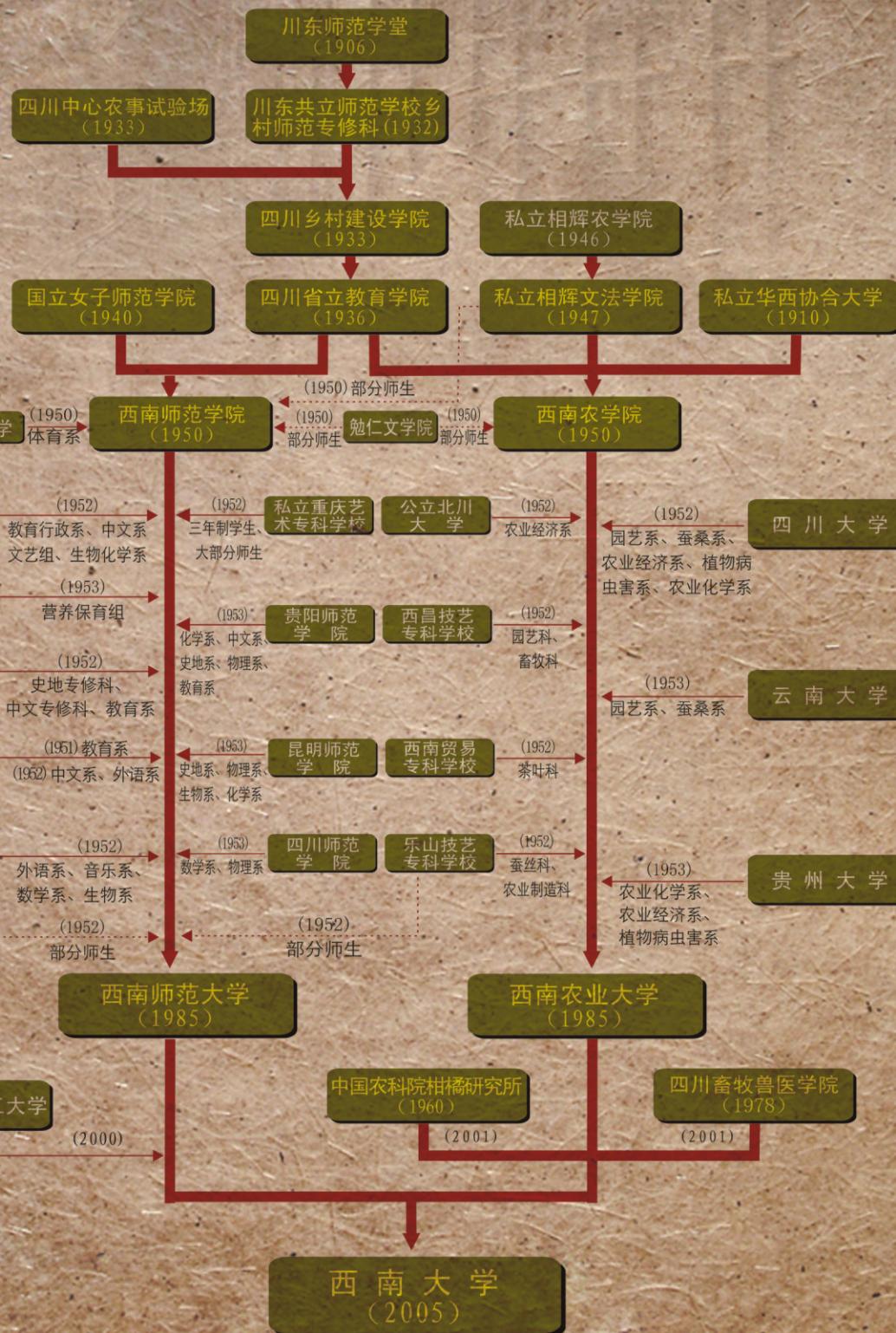




历史沿革

LISHI YANGE



(注：2008年12月，西南大学档案馆经广泛查阅资料，修订并完善了西南大学发展沿革图）

西南大学记忆

名师风采

科教兴国 实干兴邦

——深切怀念何文俊教授

忆恩师何文俊先生

校史校情

西南大学百年校史，不能忘了卢作孚

为人师，孜孜不倦 为学者，兢兢业业

——记西南大学资深教授黄希庭

西大掌故

侯光炯还“债”

蜀园的由来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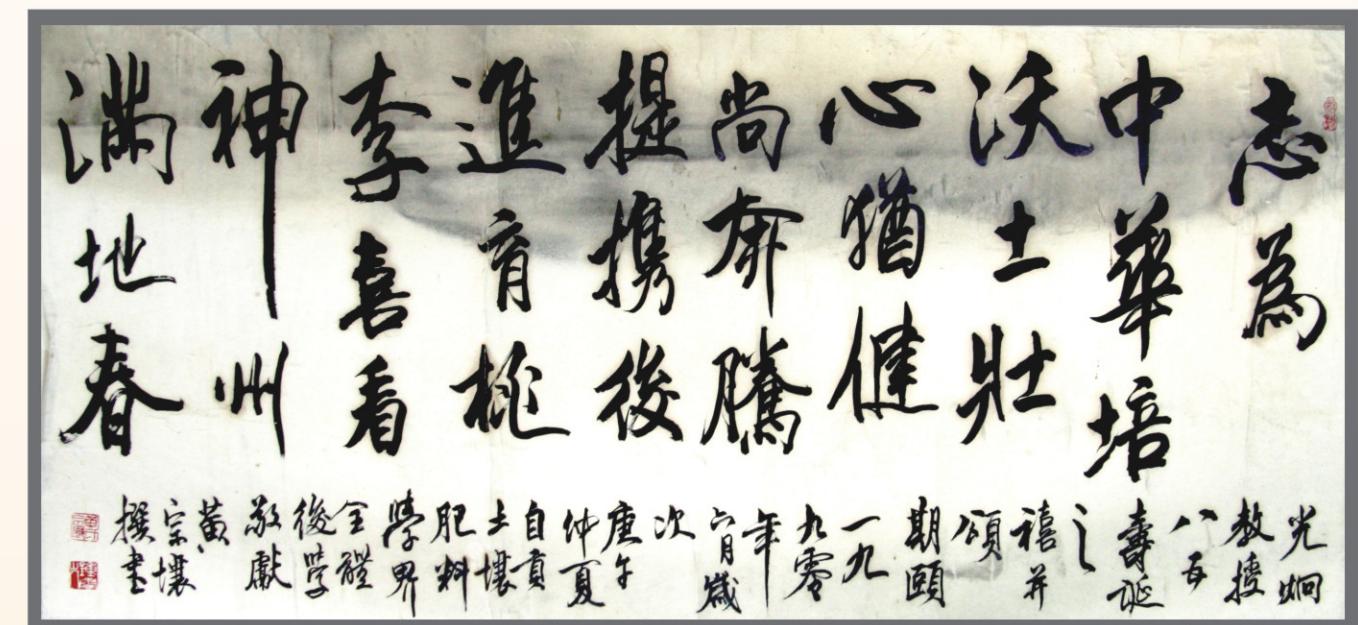
2012年第4期
(总第17期)





何文俊与同事合影（左起：欧阳秩、何文俊、李隆术、王辅）¹

¹图片来源：《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编委会.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黄宗壤¹书法作品²

¹黄宗壤，书画家、诗人、作家、书画教育工作者。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华诗词学会、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四川省诗词学会会员；四川省书学学会理事、书法家协会主席；国家二级美术师。从事美工、艺术创作、辅导、行政和教学长达四十余年，在文艺界资深誉广。黄宗壤以行草见长，兼采诸家，形成结体多变、用笔精妙、流畅自然、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

²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HGJ-SW13-1.0002。

刊首语

□文/张晓华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对一所大学来说,大师就是这所大学的“仙”和“龙”。大学也许可以没有大楼,但却不能没有大师。大师们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兼备,是知识和品质完美结合的代表,是知行统一的典范,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之所在。他们的优秀品质和博大思想奠定了一所大学优良的学术传统和深厚的学养基础,铸就了一所大学的精神。唯有这种精神,使大学经世而独立,历久而弥新。

在形式主义较为盛行的今天,与大师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会引领我们超越物质,寻找到精神上的平和与宁静,激励我们携手并肩,薪火相传,用智慧演绎进步和发展。



西南大学记忆

2012年第4期(总第17期)

主办: 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顾问: 张跃光 丁忠民 靳玉乐

李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 袁隆平

主编: 吴江

执行主编: 张晓华

执行编辑: 刘润

编委: 邓力 潘洵 刘重来

编辑: 郭兰 杨程程 肖艳

蔡安庆 马静 熊晓汶

李天兰 颜永友

美编: 刘润

校训:



目

刊首语 张晓华

名师风采

4 科教兴国 实干兴邦

——深切怀念何文俊教授 杨程程

9 忆恩师何文俊先生 吴大椿

校史校情

11 忆段大明同志在柑桔研究所的二三事 叶萌民

13 西南大学百年校史,不能忘了卢作孚(一)

——记卢作孚对创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重大贡献

..... 刘重来 周鸣鸣

21 侯光炯纪念馆 张晓华

25 最后的呼唤 永远的微笑

——悼良师、挚友侯光炯院士 刘秉臣

32 导生传习制在北碚 张晓华

36 为人师,孜孜不倦 为学者,兢兢业业

——记西南大学资深教授黄希庭 蔡安庆

40 教泽深远,功在后学——记徐德庵教授 杨程程

42 兴农让学子成才 科技促蚕农致富 林元吉

录

校友天地

46 从“小猪倌”到“鹅司令”

——记大学生回乡创业模范邓费建、邓波兄弟 熊晓汶

影像记忆

51 西南农学院的首任院长—李世俊 韦乔雅

西大掌故

55 侯光炯还“债” 张晓华

57 邓子琴灶口偷光 邓 力

58 蜀园的由来 姚 恒

校史论坛

59 高校校史研究的瓶颈及对策分析 张晓华

他山之石

62 走进红色南昌

——记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 李天兰

封面人物 何文俊

封二 何文俊与同事合影

封三 黄宗壤书法作品

封底 西南大学历史沿革图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本刊地址：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023-68250107
13436041609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250073

投稿信箱：xdjy2009@126.com
邮 编：400715
照 排：重庆新综艺图文广告

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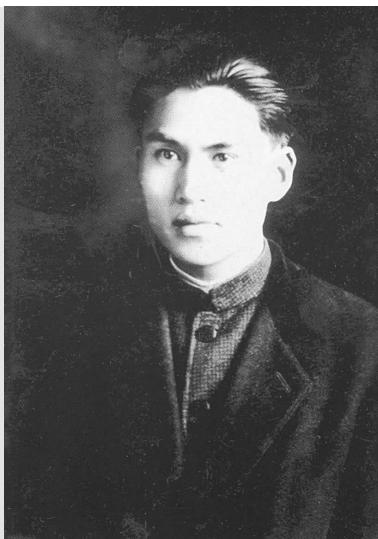
科教兴国 实干兴邦

——深切怀念何文俊教授^[1]

□文/杨程程

好学上进，成绩斐然

何文俊，四川巴县（现重庆市巴南区）人，生于1909年8月30日。幼年时住在重庆市神仙口街，家中贫困，靠父母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何文俊自幼聪颖好学，勤奋刻苦。他曾就读于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每期终考成绩均名列前茅，因此受到校方奖励，免费升学。何母非常支持何文俊读书，经常靠做绣花或当奶娘供给他零用钱，但因家中经济实在困难，何父希望他辍学回家，父母便为此争吵不断。后来何文俊的婶母到家中劝和，积极支持何文俊继续求学。为



何文俊教授（1940年圣诞节，多伦多）¹

了让何文俊读书家里只好向亲友借贷，欠下了不少债务。

1929年何文俊于成都华西大学生物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据其弟何华祥回忆：他在华西大学读书时，学校放了暑假，他想回家探亲，但路费短缺，他便步行，翻越了农泉驿山脉，跋涉崎岖难行的山路，走了七天才回到家中，父母发现他的双脚都肿了，十分心痛。

1930—1932年，何文俊获得罗氏基金会奖学金到北京燕京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动物学家秉志教授，并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何文俊回到华西大学任生物系讲师，并于1935年评为副教授，当时他才26岁。同年，何文俊留学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任生物助教，并修读生物学方面的博士学位。1936年转赴美国爱沃华农工学院，师从国际著名植物病理学家梅尔哈斯教授，攻读植物病理学，兼助教、讲师，并于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美期间何文俊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美国大学金钥匙奖。

科教兴国，实干兴邦

1941年，满怀爱国热情的何文俊向梅尔哈斯教授提出回国的申请，梅尔哈斯教授说：“你疯了吗？工作得好好的，现在中国又正在打仗，还是暂时别走吧！”面对导师的挽留，何文俊并没有改变主意，坚决要回到祖国。当时的何文俊踌躇满志，怀抱着救亡图

¹ 图片来源：《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编委会.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何文俊教授与同事合影(1959年,昆明农学院,左起:欧阳秩、何文俊、李隆术、王辅)²

存、科教兴国、实干兴邦、富国强民的理想和热忱,毅然回到了抗战正酣、满目疮痍的中国。回国后,何文俊被聘为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教授,于1941—1949年先后担任了农业研究所所长、理学院院长,并于1946—1949年兼任国立四川大学植物病虫害系主任。1950年9月,奉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令,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农艺系与私立相辉文法学院农艺系合并,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农艺、园艺、农产制造三系为基础,成立西南农学院。私立华西协合大学

的何文俊、管相桓等9人及农艺系在校二、三、四年级学生40人随即调入西南农学院。

1951年11月,何文俊任西南农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西南农学院的组建工作。何文俊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此项工作当中。建校之初学校的临时校址在私立相辉文法学院所在地,由于农场狭小,设备简陋,不能保证教学和科研的正常进行。为解决永久校址问题,何文俊奔波劳碌,最初选在重庆沙坪坝,后几经周折,最终确定在现在学校的所在地北碚天生桥。建新校舍时,为了节省经费,何文俊自己找人设计和组织施工,在建校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如期完成了修建任务,并

按计划完成了迁校任务。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何文俊一面组建教学和行政领导班子,推动以教学为中心的全面工作,一面领导建设新学院的系统工程。为了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打响知名度,他花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拜访、敦聘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知名教授来校任教,其中包括方文培、叶谦吉、陈兆畦、原颂周、侯光炯、蒋同庆等。他还亲自选购科教仪器、订阅图书期刊等,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为西南农学院的建立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南农学院能在日后成长为综合性的农业大学与他打下的基础是密不可分的,他是西南农学院的奠基人之一。

何文俊的教育思想是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教学必须联系实际,科研应为生产服务,三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他教学,从不囿于书本和课堂,做小麦锈病实验,就安排学生到大田中去真刀真枪地调查锈病的严重危害,做红苕黑斑病实验就到校农场去,讲梨锈病就到缙云山上去认识和采集梨锈病的转主寄主——松柏上的冬孢子角,这样联系实际,就使学生们学得快、感受深、记得牢,也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何文俊教授主持西南植保教材编审会工作照片(1959年,昆明农学院)³

² 图片来源:《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编委会.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³ 图片来源:《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编委会.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名师风采

何文俊多次强调,科研要为生产服务。他曾说过,要在大田找题目,室内作研究,小田摸规律,大田出成果。所以,他所研究的、所解决的问题,都是从生产中来,均是生产的关键问题。1959年,重庆某个奶牛场的管理员带着一包红苕到西南农学院院长办公室找到何文俊,说他们奶牛场的奶牛因为吃了红苕死了两头。当时何文俊正在开会,就叫植保系植病教研组的舒秀珍老师帮忙鉴定。舒老师经过仔细检查和对照,认为很有可能是红苕黑斑病,但不能确定,便打电话告知何文俊,希望他有时间的时候能过来看看,确认一下。何文俊很快就来到实验室,他看了薯块的症状,又看了显微镜下玻片的病原菌便肯定是红苕黑斑病。当时黑斑病是检疫对象,在重庆尚未出现过。对此,何文俊高度重视,当即采取一系列措施:第一,将管理员带来的红苕全部封存并制作成标本供教学使用;第二,马上写一份“病虫情报”并提出防治措施向有关方面通报,以引起有关领导和单位的重视,防止病害的传播和蔓延;第三,将奶牛场的所有病薯用消石灰处理深埋销毁。之后,何文俊组织学校教师和学生在井口农场和学校进行防治试验研究工作,筛选出最有效的药品,并将研究结果推广到四川的南充、西充、营山等地红苕黑斑病重病区进行试验示范,起到了良好的防治效果。他亲自到江北农场等地调查柑橘溃疡病,并决定对这种毁灭性的病害,采取火烧的办法彻底消灭,这种办法,沿用至今。他还曾带领西农多位教授到南充等地解决水稻大面积坐蔸问题。在学校,他邀约陈兆畦、管相桓、陈强等教授组织反常代谢实验室,解决稻瘟病等防治难度极大的病害,从选用抗病品种着手,引进100个品种在多地种植,从抗病机理、致病机理方面入手研究,主张多学科联合作战,从根本上解决重大病害问题。

指导学生,关心职工

何文俊学识渊博、教授有方,对学生和蔼可亲、关怀备至,深受广大学生的爱戴。何文俊因曾留学国



何副院长(中)与群众一起跳集体舞(右起:熊济华、余永年、何文俊、段佩琼、田筱君,左后立观者,左起:欧阳秩、李隆业)⁴

外,讲课时中英文并用:中文讲解,英文板书。为加深学生理解还常在黑板上绘出生动的示意图。由于条件所限,学生学习英文十分困难,特别是专业术语,当时国内并无真菌学专业术语的英汉对照书刊,学生们不得不经常向他请教,不管多忙,何文俊对于学生的询问都会耐心地诠释。他在实验课中所用到的实验玻片标本都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如马铃薯粉孢菌、内生集壶菌和黑根霉的接合孢子等。何文俊很喜欢真菌,见标本就采,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四川所采的白粉菌标本,迄今仍完好地保存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菌物标本馆中。何文俊对学生的始终要求严格。学生观察真菌绘图不清晰不典型,他就帮学生找好典型代表图,要求仔细测绘、掌握特征,决不可马虎。

作为老师和学校领导,何文俊对学生和教职工的生活也十分关心。1952年西农全校学生体检,查出40多人患有结核病,学校立即成立了保健组,集中在夏坝疗养。保健组内组建领导机构及党团组织,并设立文娱设施,如乒乓球、羽毛球、棋牌等等,成立了营养食堂,还定期由医生送药和赴医院复查。学生在治疗期间,何文俊经常亲临保健组探望,关心学生的病情和学习情况,鼓励大家安心治疗、适度学习。对此同学们始终心怀感激。何文俊在国立四川大学

⁴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6。



陪同上级领导视察学校⁵

植物病虫害系任系主任时,因为正处在抗战时期,学校经费短缺,教师的待遇微薄,系里基本没有科研经费,极大的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教师的积极性。何文俊便通过多种渠道,向农村复兴委员会争取到了一笔可观的研究资金,并把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全系教师的科研津贴,大大缓解了教师们的生活压力,提高了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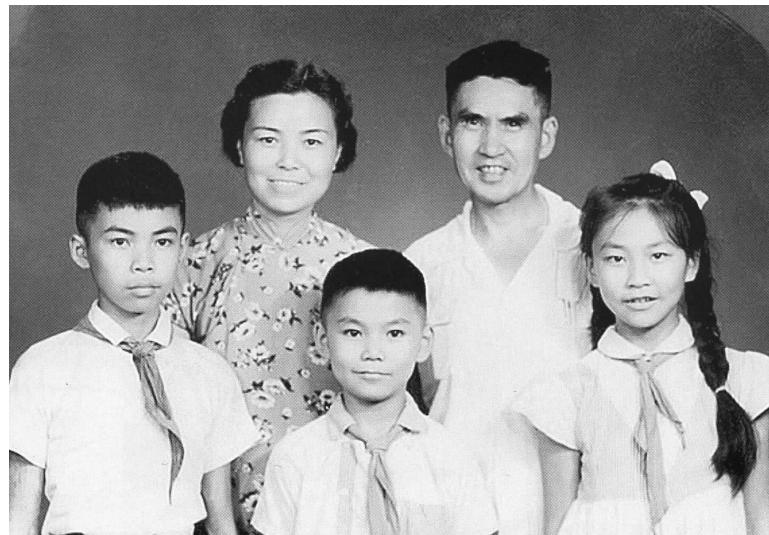
不堪受辱,以死明志

自大跃进以来,中国政治持续向左倾斜。1963年,中共中央在评估了我国形势后,认为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1964年中共中央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

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些指导方针,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致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

何文俊作为一个专注于学术的学者,身上总会带一些文人的耿直与率真,很是缺乏政治敏感性。在此背景下,他的言行举止总会被激进的左派人士抓住大做文章。中共西南农学院委员会于1964年11月25日上报重庆市委宣传部有关何文俊的政审和现实表现材料各一份,希望剥夺其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资格。在这份《何文俊现时表现材料》中何文俊的所有举动皆被认为是反党、反人民的。《材料》中罗列了何文俊的几大罪状。

第一,对于党的教育方针,何文俊口头上是拥护的,但实际上抵触不满。何文俊作为一名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于当时国家混乱的教育状况十分不满,生性耿直的他曾在不同场合不加掩饰的将自己的不满表露了出来。《材料》中就引用他的话:“58年以来,把教学秩序简直打乱了”,“过去苦心经营的,现在残缺不全了”,“我们到成都开会,别人说我院毕业生质量差,我们的老教师简直不敢抬头,只有我向别人赔



何文俊全家合影(1964年夏)⁶

⁵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收集的老照片—档案馆—66。

⁶ 图片来源:《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编委会.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名师风采

小心”。其实,这只是一个正直的教育工作者痛心疾首的发泄,却被有心之人作为他不满党的教育方针、否认教学质量提高的证据。

第二,在科学的研究中与党争夺领导权。1963年何文俊将陈让卿、管相桓、李友霖、刘佩英等教师作为全国科研十年规划重点课题的主持人,而这些人是被定性为刚摘帽子就企图翻案的右派分子。何文俊还始终紧抓植物病理方面的课题,强调实验室工作的重要性。学术本与政治无关,搞科研是何文俊的本职工作,任命课题主持人也是以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为依据,但却被污蔑为热心科研完全是为了出名得利,任命右派分子是与党争权。

《材料》中最后一项罪名是:“何文俊借关心教师生活为名,公开搞福利活动,企图笼络人心,削弱党的领导。何文俊著书得稿费1000元,他表面向领导表示要交公,党委不接受,请他交给工会作职工福利费,他却又不干。而拿去在‘九三’组织内搞福利活动。何文俊不仅拉拢党外人士,而且还在党员身上打主意。党员系主任李隆术,因小孩生病花了几百元钱,何文俊得知后,马上亲自上门表示借200元给李隆术。学院清理家属中五类分子返乡时,教师陶启珍的地主母亲被清理回乡,何文俊深表同情,在‘九三’组织内为陶启珍的母亲筹捐了路费40元。”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自己挣的钱不能随意支配;作为领导,作为同事关心爱护他人也被视为别有用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对何文俊的迫害更加严重,他与学校的其他领导一起,被迫每日一边写检讨,一边劳动。那时他已五十多岁,经常被指派干重活,不仅要下水田,还要担100多斤重的粪。最终,不堪受辱的何文俊在1967年2月13日投湖自尽,终年60岁。家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封遗信,是要

上呈毛主席的,信上写道:“我受冤枉,解放以来,都在努力学习改造资产阶级思想,逼迫我交代的材料,说我反党反社会是冤枉的。”直到1978年,何文俊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逝者已矣,惟以此安慰在世之人。

何文俊始终坚信科教兴国,实干兴邦。他的一生都在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农业发展服务。为振兴祖国,他舍弃了国外安逸的生活回国从教。他服从指派,为组建西南农学院呕心沥血,教学、行政双肩挑,指导学生学习,关心职工生活,维护学校发展。他为人正直热情,具有同情心,深受学校广大师生的爱戴。他的逝世,是师生们心中永远的伤痛,是西南农学院巨大的损失,也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大遗憾。时至今日,他的音容笑貌仍长存于学生心中,不能忘怀。

山城驰骋忆华年,骤遇狂涛天地眩。娓娓暖心迎朔风,汹汹寒啸共西园。冷凝偃蹇羞瓶活,热润舒枝竟展颜。遥拜苍山逝去鹤,桃丰李盛满街看。⁷

参考文献:

- [1]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于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何文俊的人事档案。何文俊《干部档案》正本,编号SW0702-004,内中是何文俊先生个人在各个时期所填写的表格、履历、个人历史自述以及其它有关调查资料等文档。文中凡采自档案材料者,不再出注。
- [2] 《何文俊教授纪念集》编委会编.何文俊教授纪念集[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张晓华)

⁷ 毛家贤.缅怀先师何文俊先生[C].《何文俊教授纪念集》编委会编.何文俊教授纪念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P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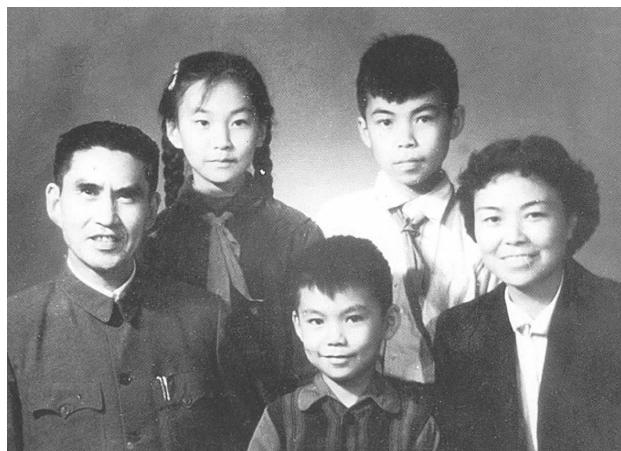
忆恩师何文俊先生

□文/吴大椿

何文俊先生不幸离我们而去，已经40多年了，但他的英容笑貌，总不时的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将记得的几件事记述下来，以寄托对何文俊先生的怀念之情。

饱含爱国爱民深情激发学生学习

1962年，肩负重任的西南农学院副院长何先生，手执教鞭给我们讲授《普通植物病理学》。他举止端庄，言词清楚，表述严谨，语言生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堂课，他从自己在戴芳澜先生的倡导下，为了研究开发四川丰富的真菌资源赴美学习的过程，讲到日本侵略时期带入红苕(甘薯、红薯)黑疤病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我国植病研究的成果，以许多生动的实例，深入浅出的讲解了学习的目的、意义和方法，一下就激起了大家学习的热情。从此，我和陈思勇等同学就经常去实验室和何先生的家中请教学习。



何文俊全家合影(1963年国庆,重庆)¹

爱生如子关怀学生成长

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到何先生的实验室或家中，他和田老师(何先生的夫人)都热情欢迎。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和陈思勇去何先生的家中，刚好他参加人民代表会回来，当时正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品非常缺乏，何先生立即拿出在会上省下舍不得吃的小点心招待我们，当晚不顾会议和旅途的劳累和我们谈到深夜，叮嘱我们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要意志坚定，克服自然灾害带来的短时期困难，努力学习。

何先生耐心细致地指导我们的学习，每次有问必答，耐心讲解。如当我们对病菌生理小种与寄主抗病性理解不透时，他就亲自带我们到马铃薯抗性研究的试验田中去，结合实际讲解。当他发觉我对病理中真菌部分兴趣较浓，就推荐和指导我阅读《真菌概论》。他的指导使我在日后的学习和教学中受益不浅。

1964年，我毕业后分配到湖北工作，碰到了我从未见过的棉花枯萎病，就写信向何先生请教，信寄出去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对我所提问题何先生都作了详细的解答，并指导如何进行研究，使我的工作顺利开展。后来何先生赴江西考察，到合川组建实习农场，忙于教学改革，我写去的信不能亲自回信，他就请田老师代笔回信，直到“文革”才中断了联系。

夜过龙凤溪深入农户搞科研

当时四川许多农民都以红苕为主食，何先生多次饱含深情的给我们讲，由于红苕黑疤痕的危害，造成

¹ 图片来源：《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编委会.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何文俊教授参加中国植保学会第一次病毒会议留影(1963年)²

粮食短缺，农民吃不饱，有的农民还因为下窖取红苕，不知窖下面红苕已腐烂，而被淹死在窖中的悲惨事例。所以，他要研究解决防治红苕黑斑病这个难题。

据我记忆当时何先生研究红苕黑斑病，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研究出了一种试剂，用于检验苕干(晒干的红苕片)是否带菌，只要将这种试剂滴在苕干上，如果带菌就会显示出红色，不带菌则不变色。试剂研制成功后，何先生曾高兴地对我们讲：“苕干调运的检验有办法了，只要抽样滴上试剂就可以检测。”他研究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红苕窖藏腐烂防治。

研究防治红苕腐烂的内容很多，我和陈思勇参加其中一项，就是应用新药“401”(乙基大蒜素)防治红薯腐烂。一天下午何先生带着我们背上药和工具，下山经龙凤溪来到溪对面山顶的农家进行试验。村民们听说农学老教授何院长亲自来治红苕黑斑病，都出来欢迎，山路上，院落内都站满了人。何先生不顾劳累，带领我们按设计进行试验，由于试验工作量很大，忙到天快黑才结束，村民要留何先生吃饭，又留不住，只好用油灯给我们照明送行。何先生带领我们摸黑下山，夜过龙凤溪才回到学校。

主张坚决铲除柑橘溃疡病

四川是全国柑橘的主产区之一，当时发现有溃疡病发生，如何处理有不同的意见。何先生主张为了

国家的利益，将病株全部烧毁，省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烧毁了大批的柑橘树，使四川成了无病区，保证了柑橘出口外销。虽然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决断，但是，还是有人说他夸大危害，烧毁病区柑橘树带来损失太大。每当谈起此事，何先生总坚定的讲：“不能只看局部利益，要看全局；不能只看眼前，要看长远，对于这件事我从不后悔。”

胸襟宽敞纳百家之长

何先生胸襟宽敞表现在多方面，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林传光与方中达先生的友好交往。我们上《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的时候，三位先生都各自编写有一本教材，按常人的做法，当然是使用和宣讲自己写的书，可是何先生却以林先生写的书为主要教材，方先生的书和他的讲稿(当时出版社未能及时印刷出来，仅有部分油印稿)为参考资料。他给我们介绍说：“林先生治学严谨，文笔很好，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方先生的书也很有特色……”，要我们都要读以吸取各家之长。

三位先生友情深厚，假期相约轮流到北京、南京和北碚三校，交流切磋教学经验。当林、方先生来到西南农学院时，何先生热情接待，亲自主持讲座，请两位先生为我们做学术报告，以使我们受到多方面的教益。(下转第 61 页)

² 图片来源：《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编委会.何文俊教授纪念文集[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年版。

忆段大明同志在柑桔研究所的二三事

□文/叶荫民¹

段大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冲击,于1970年12月23日从重庆市副市长的岗位上下放到柑桔研究所工作,后来担任研究所生产科研组副组长职务,于1978年3月10日回重庆市工作,在柑桔研究所工作达8年之久。他办事认真、艰苦朴素、深入实际,为处于“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时期的柑桔研究所科研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他对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也令人倍感温暖,难以忘怀。

一

柑桔研究所是在原国营农场的基础上建立的,开始时一些职工在思想上还不适应科学的研究工作的要求,日常工作中发生了诸多矛盾。老段(我们平常都这样称呼他)来到研究所工作后,首先认真地了解

柑桔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和任务,明确了科学的研究的重要性。此外,他还经常和科研人员交流谈心,深入实际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品种研究室有块砧木比较试验地,6种不同砧木,嫁接2个品种,12个小区,以随机区组排列,重复使用,占地面积4~5亩。试验场有的同志提出这块地没什么经济收入,主张改种其他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作物。对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与试验场方面的同志发生分歧,意见不一。老段得知情况后,邀约有关人员到现场,大家一起协商。老段分别听取了双方意见后提出:“这块地不仅要保留,还要认真管理好。我们是搞科学的研究的,俗话说‘出丧别忘了抬棺材’。”同志们都非常赞同老段的意见,原来思想上有疙瘩的同志也转变过来。老段不仅维护了研究所内部的团结与和谐,而且使大家对科研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老段非常关心研究所的科学的研究工作,他去过广西柳州柑桔黄龙病研究基点,参加过我所在江西、湖南、北京等地有关研究课题的全国协作会。

二

1972年,英国剑桥大学吉斯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应郭沫若同志的邀请来华考察访问。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李约瑟博士携夫人及助手鲁桂珍博士来我所参观访问,搜集有关资料。这是柑桔研



段大明同志在柑桔研究所果园²

¹ 叶荫民(1929—2012),原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柑桔研究所所长,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园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柑桔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2012年1月14日逝世,享年83岁。

² 本图片由西南大学柑桔研究所提供。



1972年8月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访问柑桔研究所³

究所建立后第一次接待外宾。老段极为细致地部署了这次接待工作。首先，他安排了人员全程陪同参观，各参观点也安排了接待人员。然后，把接待室原有破旧不堪的皮沙发，统一换成较新的藤沙发，颜色不协调的木茶几，也统一铺上白色的台布，将接待室布置得朴素大方，窗明几净，同时教大家一些基本的接待礼仪和应注意的问题。总之，老段对于这次接待活动是周密部署，事无巨细都一一过问。为期3天的接待工作，无论是参观还是座谈，客人都感到满意。柑桔研究所得到重庆市外办的赞赏和表扬。此后，柑桔研究所还被列为重庆市接待外宾的开放单位。

三

老段非常关心群众的生活，时刻把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柑桔研究所原来的生活和生产用水都是从附近的磨滩河抽取的，后来发现河水污染严重（主要是铬超标），严重危害着研究所的生产安全和职工的身体健康。老段得知后认为这是关系到职工健康的大事，非解决不可。他积极联系有关部门到研究所所在地区勘探钻井，寻找合适的饮用水源。原来认为研究所及其附近地区地下水资源贫乏，经过地质队的多处钻探，终于找到了适合饮用的水源，解决了研究所的用水问题。

四

1971年7月，柑桔研究所被下放到四川省，由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领导工作。“文革”结束后，1978年2月，中国农业科学院之前下放到地方的研究所，大多数单位都恢复了“以部为主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而柑桔研究所却被明确为“以地方为主双重领导”。研究所几位科研人员上书邓小平同志，都希望恢复“以部为主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这样更有利于我国柑桔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为了使这

封信能真正送到邓小平同志手中，老段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写信请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代为转交。由于1977年在京举行全国柑桔新品种鉴评会时，程代振和我曾陪同老段到耀邦同志的家拜访过，因此这次送信的任务就由我来完成。1978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去了耀邦同志的家。耀邦同志询问了老段的近况并问及我国柑桔科研和生产情况，以及国际柑桔科研、生产的情况。耀邦同志看了我们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后说：“你们何必写这么多，要言不繁嘛！小平同志要想了解更多，他会派人去调查的。写这么多字又小，让小平同志怎么看？”他答应把这封信交给小平同志的秘书。当年12月6日，根据方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柑桔研究所顺利恢复了“以部为主的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

1978年3月老段调回重庆市里工作，仍然非常关心柑桔研究所的人和事。1995年研究所程代振同志患病住院期间，老段专程到医院看望；程代振同志逝世时，老段和夫人顾保珍亲自赶来参加了追悼会，此时他已是85岁高龄了。

2002年5月31日22时8分，段大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2岁。段大明同志逝世后，胡锦涛、李鹏、乔石、宋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以不同形式表示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责任编辑 刘润）

³ 图片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50年》，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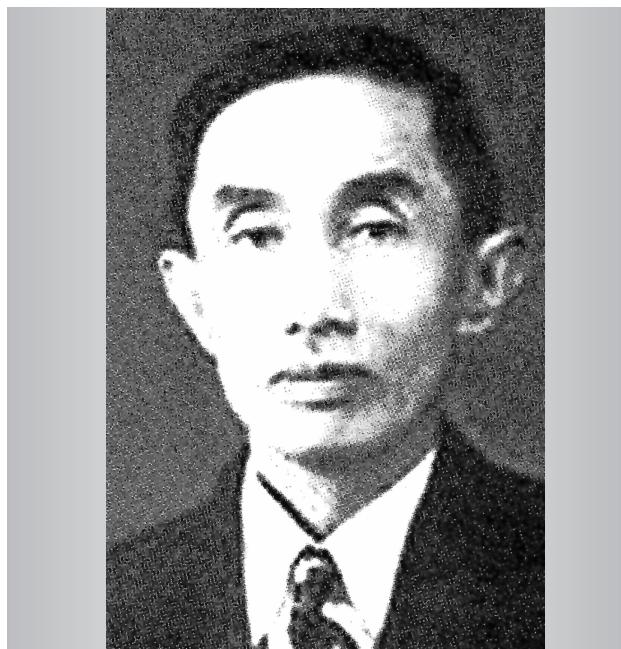
西南大学百年校史,不能忘了卢作孚(一)

——记卢作孚对创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重大贡献

□文/刘重来 周鸣鸣

由晏阳初先生于1940年10月在北碚歇马场创办的私立乡村建设育才院(1945年更名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是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因此,要论西南大学百年校史,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是其重要篇章。

然而谁能想到,有一位曾对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建和发展一直给予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的人,竟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北碚的开拓者、晏阳初的挚友卢作孚先生。从这所学校选择校址、购买地基、筹措经费、网络师资、添置设备等等,无不尽心尽力、竭诚帮助,贡献很大。卢作孚对此从不宣扬,而晏阳初却铭刻在心。



北碚开拓者——卢作孚¹

1946年11月,时任乡建学院院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笔者)总干事的晏阳初,在给平教会驻美国纽约办事处汤静怡的信中,要汤静怡热情周到地接待正在美国的卢作孚,他在信中特别指出:卢作孚“不仅是我私人最好的朋友,而且是平教运动的重要支持者”²。

晏阳初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两人在救国救亡、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等问题上志同道合、心心相印,而且也是因为在晏阳初创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得到了卢作孚的热情支持和真诚帮助。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1940年10月创建于重庆北碚歇马场大磨滩,占地500亩,初名“私立乡村建设育才院”,这是晏阳初与平教会为培养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人才而创办的学校。建校11年(1940—1951年),共招收学生1180人,几十年来,这些学生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特别是在乡村建设、农业科学、农业教育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卢作孚其人

提起卢作孚,他的一生,大致可以从4个方面概括:

第一,卢作孚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他在1925年创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一条仅70吨的小火轮起家,“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短短10年间,不仅将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了

¹ 图片来源:《北碚文史资料第18辑》。

² 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692。由于本文引用此书较多,为简便起见,以下引此书之引文只在正文该引文后注明此书页码。

校史校情

川江，并发展成为旧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民营航运企业，被誉为“中国船王”。他倡导的“民生精神”也被誉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内企业文化建设卓有成效的一个范例”³。

第二，卢作孚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曾是“教育救国”论者，当过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教师，当过主管一个地方教育工作的官员，开展过新文化运动和教育改革运动，还创办过通俗教育馆，积极开展过民众教育及科学文化活动。他写过不少有关教育的论著，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教育改革、民众教育、普及教育等都有不少精辟见解。他曾是“教育救国”论者，后虽转变为“实业救国”论者，但始终重视教育，诚如他自己1948年所言：“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⁴

第三，卢作孚又是我国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家和实干家。他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末主持的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唯一在中国西部，且时间最长，成就突出的一个。他以“乡村现代化”为宗旨，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建设模式，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建设方式，在很短时间里，就使嘉陵江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使北碚从一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场建设成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缩影”的美丽城市，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可以说，卢作孚是中国西部乡村建设的先驱者，也是推动中国乡村建设不能忘记的杰出人士。

第四，卢作孚是抗日战争中的英雄。在国家危难之际，他号召民生公司全体员工投入到抗战运输之中。他在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期间，为抢运战时人员和物资，为解决全国粮食紧缺等呕心沥血，历尽艰辛，做出了非凡贡献。特别是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3万多难民和10万多吨机器和军用物资设备滞留宜昌，无法撤

到大后方。在此紧急关头，卢作孚亲自赶赴宜昌，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他不顾个人安危，集中民生公司全部船只，并组织其他船只分段运输，日夜兼程，在40天里，硬是把全部难民和绝大部分物资设备抢运入川。在这3万难民中，不少是教师、学生、工程师、艺术家、科学家、公务员等，他们安全撤离，为国家保存了大批人才；而这10万吨的设备器材，都是中国重工业、军事工业、航空工业的精华，它们安全转移到大后方，不仅保存了中国工业基础，而且为支援抗战和大后方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卢作孚这一壮举，被晏阳初赞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二、一见如故，引为同志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卢作孚和晏阳初分别在重庆北碚和河北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两人虽然天各一方，但他们所奋斗的事业是一致的，这就是他们相识相知的缘由。正如晏阳初在1982年回忆他与卢作孚初识时所说：“我现在已记不清究竟哪一年与他结交。我们在定县的时候（1929—1936年）他已经对乡村改造发生兴趣，曾请了一位姓何的朋友来参观我们的工作。”^[P478]可见，卢作孚与晏阳初最初结识，是因为他俩都在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卢作孚向晏阳初学习，最早应追溯到1930年春他率队出川考察之时。当年的7月17日卢作孚一行在北京考察时，专门去会见了平教会负责人陈筑山、汤茂如两先生，“问定县的平教经营很详”。在卢作孚《东北游记》中有记：

“据说：定县教育计划分为四类：第一是文艺的，第二是生计的，第三是公民的，第四是卫生的。第一期侧重文艺，现正在第一期。第二期侧重生计，现正在准备第二期。文艺以民间文学为主，生计以农业为主，公民以乡村自治为主。试验区域有三四十村，拟更以一村为中心。定县城内有百余职员，其组织分三部：第一部行政，第二部教育，第三部学术。各职员轮流到四乡担任实施教育或调查任务。”⁵

从卢作孚如此详细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对晏阳

³ 厉以宁.《卢作孚文集》序[A].凌耀伦等编.卢作孚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

⁴⁻⁵ 凌耀伦等编.卢作孚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40、143。

初的乡村建设是多么重视。之后,他又派人专程去定县参观。

而他们第一次见面,却是在1935年10月。当时,晏阳初到无锡参加第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后来到南京,与刚从广西考察后到南京的卢作孚不期而遇。卢作孚光头,穿布衣短服,完全没有大实业家的派头,而其睿智和卓识远见,更让晏阳初印象深刻。因此,回去后,他在《关于出席乡建学会会议等经过情形的报告》中特意讲述了这次不平常的会见:

“在南京还遇到卢作孚先生。他是四川的一个实业家,我们彼此相知已久,却从未会过面。这次在南京会面之后,一见如故。大家谈谈奋斗的经过,不禁引为同志。因为他在四川的努力,不仅是为四川而四川,目光也是注于全国,对于救亡图存的问题,非常注意的。……他也希望我们派人到四川去帮他们的忙。”^[P381]



生活条件的艰苦没有动摇平教会同仁“扎根”农村的初衷⁶

本来,晏阳初是在向平教会的同仁汇报他出席全国乡村工作会议情况的,但他却在汇报中特意补充了他在会外见到卢作孚的经过,可见他对第一次与卢作孚见面是多么重视。他和卢作孚谈起各自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奋斗经过”时,都很激动。使晏阳初进一步认识到卢作孚不仅目光远大,事业心强,而且忧国忧民,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因此,他俩虽然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引为同志”,谈得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以后,他们在共同的事业中彼此加深了了解,关系更加密切了。甚至心知到那怕彼此之间一句话、一个字也能心领神会。如

1942年7月10日,晏阳初在对乡建育才院“同学会”作《关于忠恕忍恒精神的修养》的演讲中,就对卢作孚强调的一个“恒”字作了精彩的发挥:

“还有一个字,就是昨天卢作孚先生所说的‘恒’字。许多青年说‘我对于这个事没有兴趣’,但是你怎样知道是没有兴趣,还是因为懒惰呢?还是碰到困难就没有兴趣?这里作作觉得不合适,那里作作也觉得不合适,这怎么行?这如何能培养成奋斗的精神?我国的留学生回国,也就是因为这里混混,那里混混,结果一事无成。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无恒。……‘恒’就是继续不断地奋斗,奋斗到底,正如同将铁杵磨成针一样。”^[P162]

三、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从20世纪二十年代起,卢作孚和晏阳初都在为中国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而奔忙。1926年秋,晏阳初率领平教会的同仁们,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乡建试验区,特别是以该县翟城村为中心,进行平民教育、农业改良和社会调查。通过调查研究,他提出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为“愚、贫、弱、私”,即文盲、贫穷、疾病、恶政等“四大病”。对此,他倡导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连环教育方式(即“三大方式”),来推动生计、文艺、卫生与公民“四大教育”,进行乡村改造,以实现其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建设”。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从书本、课堂走出来,深入农村。他亲自带领一批知识分子到定县农村安家落户,其中不少是留美博士、硕士和大学教授,当地农民誉之为“博士下乡”。他们的工作,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和赞许。

而卢作孚自1927年春担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以后,提出了“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的口号,开始着手实施嘉陵江三峡的乡村建设。他在北碚开煤矿、修铁路、设电站、办工厂、建农场、兴教育、倡文化,短短二十年间,就使北碚这个昔日匪患频繁,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的偏僻小乡场建设成具有“现代化缩影”的美丽城市。卢作孚的成就,不仅引起了海内外的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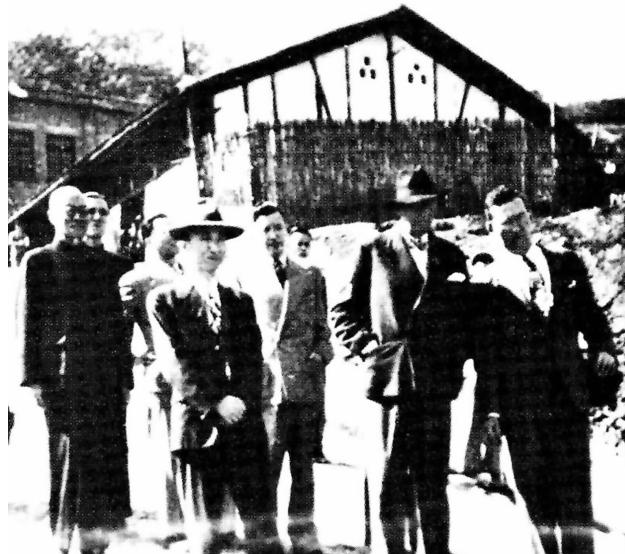
⁶ 图片来源:《从晏阳初到温铁军》第45页插图。

校史校情

视，也深得晏阳初的赞扬。1939年晏阳初应卢作孚的邀请到重庆北碚参观了卢作孚在这里推行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被这里的迅猛发展深为感动。晏阳初向平教会的同仁谈到了他这次北碚之行，他说：

“重庆的北碚有卢作孚先生所热心经营的乡村建设区，他无论如何要我和梁漱溟先生前去参观一下。我看到那里的工矿经济建设，都很有成绩。将来希望本会（平教会——笔者）能和那边合作，使他们的经济建设，与我们注重的教育政治工作，有一个联系。”^[P123]

由此可知，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工作，虽然已很有成就，但他仍很虚心，切盼已在乡村建设上有理论、有建树的晏阳初、梁漱溟能给予指导。所以，他才执意邀请晏、梁到北碚参观。而晏阳初在参观之后，除赞叹其成就外，也看到了彼此在乡村建设“注重”点上的差异，更希望彼此“合作”，加强“联系”，以取长补短，把乡建事业搞得更好。



卢作孚陪同加拿大大使参观北碚⁷

卢作孚创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过二十余年的惨淡经营，终于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民营航运企业集团。1939年10月，当晏阳初应卢作孚之邀，参观了民生公司之后，十分激动，回去后在平教会的周会上畅谈了他的感想：

“卢先生经营的民生实业公司，从5000两银子资本开始，现在已增加到2400万元，成为国内有名的实业家。他所做的种种工作，虽然不同于我们的县政改革，但共同建设中国的最大目标却完全相同，所以双方的合作，不过是时间问题。”^[P3123]

晏阳初对卢作孚办实业是多么理解，他是从整个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这一高度来看卢作孚的事业，认为卢作孚办实业和他们的县政改革虽然不一样，但“共同建设中国的最大目标却完全相同”，这就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也是他们友情的基础。五十多年后（1982年），晏阳初对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的认识更深刻了，他说：

“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交通，长江是交通要道，需要轮船，所以他组织民生轮船公司，以应时代的需要。”^[P477]

晏阳初作为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的人，竟能如此深刻理解卢作孚办实业的苦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卢作孚自从见到晏阳初后，对晏阳初的远大抱负、实干精神也非常佩服。晏阳初是四川人，虽多年在外，但他对四川的发展、经济建设一直十分关心。他认为四川建设千头万绪，必须有一个用科学方法去设计协调的机构，提议成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已出任四川建设厅厅长的卢作孚非常支持，并热情邀请晏阳初参与其中，晏阳初愉快的接受了。此事，晏阳初在1936年2月向平教会同仁们作该年度工作计划报告中说道：

“此次在京（指南京——笔者）与四川建设厅卢厅长有数度之接洽。诚以设计委员会之主要活动，实为襄助建设厅，若吾会（指平教会——笔者）工作能与建设厅协联共计则颇可为。卢厅长对此点甚为首肯。”^[P455]

诚如台湾吴相湘所著《晏阳初传》中所说那样，晏阳初之所以提出并同意参与四川省设计委员会工作，除了考虑到抗战时期“建设四川，在全国具举足轻重的作用之外，还因为他看到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挽请著名企业家卢作孚担任四川省政府建设厅长，尤见积极建设桑梓的热诚”⁸。

⁷ 图片来源：《北碚文史资料第18辑》。

⁸ 吴相湘.晏阳初传[M].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362。

不久,四川省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刘湘任设计委员会委员长,晏阳初任副局长,实际主持设计委员会的工作。从此以后,他把很多精力用于四川的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如此,他还鼓励和动员平教会的同仁到四川去开展工作。1936年3月30日,他在平教会《第六次大周会上的讲话》中说:

“此外如省(指四川省——笔者)政府秘书长邓鸣阶先生,建设厅长卢作孚先生,及其他各方面都热烈盼望我们全体同志入川工作。平心论之,这些都是极不容易得到的政治条件。”^[P448]

晏阳初把建设四川作为自己与平教会义不容辞的工作,这和卢作孚热情邀请,求贤若渴也是分不开的。而晏阳初为四川的建设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仅从他1936年和1937年所作的几个讲话,如《在四川纪念孙中山造林会上的讲话》(1936年3月12日)、《如何建设“新四川”》(1936年10月2日)、《在长沙同仁会上关于四川工作的讲话》(1936年10月20日)、《对在川同志之勉励词》(1937年3月21日)中,就可以看出个大概来。

而晏阳初对卢作孚在北碚的事业也是大力支持和乐意参与的。如1945年11月,卢作孚把民生公司图书馆、北碚管理局民众图书馆和中国西部科学院图书馆等合并组成北碚图书馆,并组成了理事会。在卢作孚等人的盛情邀请之下,晏阳初欣然出任理事长。可知晏阳初热爱北碚,也想为北碚的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晏阳初对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取得的成就非常赞赏。如1948年11月他在对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同仁的讲话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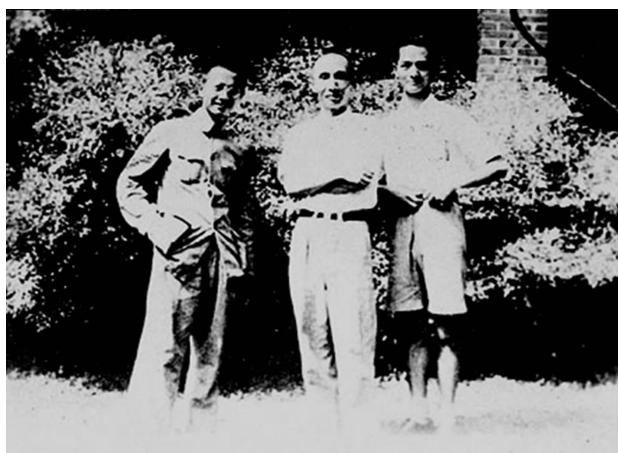
“昨天我在北碚看见不识字的农民现在识字了,从前没有组织的,现在有组织了。从前没有饭吃的,现在收入也增加了。一个个地对着我们发笑,使我获得无限的兴奋和愉快。”^[P344]

1931年5月24日的《嘉陵江日报》称:“国内外人士讲评,全中国有三大干净之地:一个是定县,一个是济南,一个便是北碚。”可见以教育兴农的“定县模式”和以“乡村现代化”兴农的“北碚奇迹”在当时已有多么大的影响。

四、为创建和发展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伸出援助之手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华北即将沦陷,晏阳初主持的平教会被迫中断了他们在河北定县等地农村进行的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实验。1939年,他们历经艰辛,辗转来到重庆大后方。为了继续他们的乡村建设事业,培养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人才,晏阳初决定筹建一所乡村建设育才院。然而,晏阳初与平教会同仁,初来乍到重庆,人地生疏,加上经费缺乏,要创办一所高等学院,谈何容易。正在此时,早已与晏阳初志同道合,关系密切的卢作孚知道了此事,非常赞赏晏阳初办学壮举,向他伸出了热情之手。他不仅盛情邀请晏阳初到北碚来办学,而且不顾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繁忙公务,亲自出面,多方奔走,为协助晏阳初选定校址、购买地皮、筹集经费、网罗师资、添置设备而尽心尽力。

首先是选择校址。晏阳初接受了卢作孚的意见,决定在风景秀丽的北碚建校。但具体在北碚哪个地方建校呢?卢作孚与晏阳初一起,亲自东奔西跑,多次寻觅勘查比较,最后他们选定在北碚歇马场大磨滩。他们选择此地为校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此处距歇马场3公里,与碚青(北碚至青木关)路相通,北至北碚11公里,南至青木关13公里,交通方便。四



卢作孚先生担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期间,于1941年8月去成都,在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寓所与长子卢国维(右)和次子卢国纪(左)合影⁹

⁹ 图片来源:http://history.gmw.cn/2011-05/13/content_1955740.htm。

校史校情

周群山环抱，磨滩河流水回绕，附近有高滩岩大瀑布，景色壮丽，环境优美。院址设在乡村，目的在于使学生耳濡目染，熟悉农村社会，了解农民生活”。¹⁰但选定了校址，在购买地皮上又遇到了麻烦。“战时土地居奇，极难获得地主同意出让”¹¹。幸而卢作孚凭借多年在地方上的威信和关系，圆满解决了这一难题：“卢作孚协助，经四川省政府批准，在巴县歇马场大磨滩附近征购土地 500 亩作院址。”¹²

其次是办学经费。要办学，经费是个大问题。晏阳初主持的平教会本来就没有多少资金，正如晏阳初所说：“平教会本来是个贫穷的学术团体，所有的经费，都靠着沿门托钵得来。”¹³为了得到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对创办乡村建设学院的支持和赞助，经晏阳初、卢作孚的奔走联络，于 1939 年成立了“私立乡村建设育才院董事会”。张群任董事长，董事有蒋梦麟、翁文灏、熊式辉、张治中、吴鼎昌、陈布雷、蒋廷黻、康心如、黄炎培、何北衡、梁漱溟、张伯苓、卢作孚、晏阳初等。值得一提的是，董事会一成立，便作出了决定：“由晏阳初担任书记，卢作孚任会计，负责处理建校重大事宜。”¹⁴此时的卢作孚，卸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和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不久，正担任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论地位不可谓不高，论权势不可谓不大，但他竟能屈尊担任一所新建学校董事会的会计，去具体负责处理建校财务方面的繁琐事情，可见卢作孚对晏阳初办学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热心肠。再者，会计是掌管经费的，董事会决定卢作孚担任会计，也说明了对他的精明能干和道德为人是多么信任。

1945 年乡村建设育才院要扩充升格为独立的学院，由于学制延长，事业扩大，急需大量资金。为此，卢作孚和黄炎培、张伯苓、张治中等人发起筹募乡村建设学院经费，共募得法币 2000 万元，为学院的成立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¹⁴

第三是师资问题。师资缺乏，是学院面临的大问题。特别是 1940 年建校之初，来校任教的几位教授及家属共 21 人，在从重庆到北碚途中，因发生了客船翻

沉嘉陵江的事故而不幸遇难，其中包括准备到校担任农业经济系系主任的原北京大学农学院代院长姚石庵教授。这一事故使学院师资力量大受影响，原本要设立的农业经济系只好停办。卢作孚凭多年在地方上从事教育工作的关系，多方为学院介绍教师。

第四是设备问题。由于战乱和经费拮据，教学科研设备奇缺是学院的突出问题。当时中国贫穷落后，不少设备，必须到国外购买。1946 年 9 月，卢作孚要率领民生实业公司一批业务、技术人员去美国，并转道赴加拿大筹款和订购轮船。晏阳初找到卢作孚，请他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代购一批教育资料和仪器设备。卢作孚尽管公务忙，出国时间又短，但仍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此事晏阳初于 1946 年 9 月 9 日在给平教会驻美国纽约办事处汤静怡的信中有记：

“为物理、化学和生物专业的新生最少要购买一定的设备和仪器。这些设备和仪器在中国买不到，所以卢作孚出发之前，我们请他帮我们购买些水力利用和灌溉方面的工具。他可能需要几千美元购买这些工具……卢先生答复把这些工具带回来。”^[P676]

过了几天，晏阳初又想拜托已经飞往美国的卢作孚多订购一些水利工程系教学科研用的设备仪器。他于 9 月 16 日又急忙给汤静怡写信：“上封信中我提到要增加设备，是为物理、化学和植物专业的新生买的。我们还需为水利工程系购买仪器和设备，请您与卢先生的助手童先生联系，卢大约一个星期之前飞往美国时带了一份购物清单。”^[P682]卢作孚在美国繁忙而短暂的日子，积极为晏阳初托办的事奔忙，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当年 10 月，当这些资料、仪器、设备安全运到乡建学院时，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诚如《晏阳初传》中所说：“1947 年 10 月，晏阳初在美国选购 1940 年前后出版的英文参考书、水利测量仪器、化学实验药品及大批电影器材先后运抵乡建学院。这在国内各院校仍在忙于复员工作不暇他顾时，这些新书仪器运到，可说是迎头赶上世界新知的第一声。”¹⁵当乡建学院师生兴高采烈迎接这些新书和仪器设备从美国运来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

^{10,12,14} 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编委会等编.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C],重庆:西南师大出版社,1992.139、139、52。

^{11,15} 吴相湘.晏阳初传[M],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362、371。

¹³ 马秋帆等编.晏阳初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65。

有卢作孚的一份心血。因为除晏阳初等少数几个人，谁也不知道这些新书和仪器设备是经卢作孚之手在美国采购的。

1951年2月，奉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令，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改名为川东教育学院。1952年9月，在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中，川东教育学院教育行政系、语文系、生物化学系师生全部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其中生物、化学系的主要图书仪器，包括大批四十年代原版外文生物学、农学基础理论书籍和从美国运回的20部显微镜，万分之一天秤等仪器交西师”¹⁶。说不定今天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化学化工学院还存有卢作孚当年在美国代为购买的这些仪器设备呢。

卢作孚十分关心乡村建设学院的基础建设和生活环境。当时，乡村建设学院虽然靠近碚青路，但从歇马场到大磨滩并不直通公路，这给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生活都带来不便。卢作孚对此事一直记挂在心。1946年9月，即在卢作孚赴美前的繁忙之中，还特意提出修建歇马场至大磨滩的马路问题，并提出了筹集修路经费的具体方案。此事晏阳初在1946年9月17日致友人信中有记：

“作孚兄临行前又提及歇马场至大磨滩兴修马路事，因马路筑成后，对地方繁荣多有裨益。但大磨滩系渝郊风景区，此事作孚盼吾兄提出省府会议稿，令三区专署会同巴县之政府进行办理。经费方面，作孚兄意拟由省府担负6/10，富源水力公司担负3/10（卢作孚又是该公司董事长），本院担负1/10，敬请从速设法进行。”^[P684]

卢作孚对学院的真诚关心和慷慨无私，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在那个年代，社会黑暗，政府腐败，经费不能落实，即使修这么一条短短的马路，也非易事。从晏阳初1948年12月在对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师生演讲里提到的从乡村建设学院“到歇马场的马路，也将要开工”中可以看出，这条路在卢作孚提出的两年后仍未动工。

晏阳初还经常邀请社会名流到学院为师生演



乡建校友座谈会¹⁷

讲，卢作孚就是其中的一个。卢作孚对学院师生演讲的讲话稿今已不存，但讲的主题却深深铭刻在学生心中。有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道：

“我清楚记得1946年至1947年间，晏院长邀请社会名流来学院讲学并主持报告会。先后有国内闻名的实业家、重庆长江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乡建学院董事），讲述发展民族经济，独创民营企业的奋斗史，勉励大家依靠自己力量办实业，振兴国力。北碚金刚碑勉仁学院董事长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乡建学院董事）主讲抗日战争中所领导山东邹平乡建运动地方自治的纲领及其活动……”¹⁸

卢作孚的演讲，深受学院师生的欢迎，而卢作孚的人品，更得晏阳初的赞赏。

他在90岁高龄时，还深切怀念卢作孚，他说：

“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他组织公司的资本，是向朋友和外国借款。他自己并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的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道他的人，都敬佩他。……他不说闲话，方必有物。用字精当，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就像他做事一样，很沉着、有组织、有思想。……我常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P477]

¹⁶ 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编委会等编.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C],重庆:西南师大出版社,1992.157。

¹⁷ 图片来源:《从晏阳初到温铁军》第151页插图。

¹⁸ 曾庆权.晏院长关心水利事业[A].晏阳初纪念文集[C],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133。



重庆合川肖家场,卢作孚先生的故里¹⁹

而卢作孚对晏阳初艰苦创业,矢志不移于乡村建设的精神也十分敬佩。他在对乡建学院师生演讲中,也以晏阳初廉洁朴素,公而忘私,勤奋努力的事迹来教育大家。一次,他到乡建学院演讲,就把他在美国时见到晏阳初为学院沿门托钵,募集捐款的情景告诉同学们。至今有的学生还记得卢作孚在演讲中说:“你们的晏院长在美国也是住小旅馆,自己洗衣服,既不抽烟,不饮酒,也不喝茶,只饮白开水。”²⁰在晏阳初晚年所写《敬怀至友卢作孚兄》中也提到此事:“他先回国后,中国乡村学院请他去演讲。他说:人多以为在美国很享福,你们的院长在美国募捐,住一个小店,有一次我看他,他正在洗袜子。捐款是天下最苦的事,其苦一言难尽。”^[47]晏阳初后来得知此事,大为感动,认为只有卢作孚才真正理解他办学的苦衷。

1949年10月,即重庆解放前夕,晏阳初携家眷飞香港转赴美国,院务交乡建学院教务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魏永清教授代理。晏在美国,仍关心平教会和乡建学院事务,不时写信给予指导。但此时国内形势大变,平教会与乡建学院已受到巨大政治压力,晏却浑然不知。他在致

卢作孚信中,还夹寄一封致平教会代理干事长、乡建学院实验室主任瞿菊农教授一信。卢作孚“为谨慎起见,托友带到内地付邮转去”。他深怕晏的不慎会导致学院遭到更大压力。所以1950年5月15日致信晏阳初:“兄写信时即加注意非必要事不提,究系两个世界,容易引起误会,为学院增加困难也。”²¹卢作孚对乡建学院的关爱,由此可见。果然不出卢作孚所料,就在这一年的11月,平教会将被宣布解散,乡建学院实行军事管制²²。1951年2月,乡建学院改名为川东教育学院。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从筹建到发展,自始至终渗透着卢作孚的热情支持和真诚帮助。这一点,晏阳初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诚如晏阳初在1940年乡村建设育才院建校之初所说的话:“自从抗战到今天,全国有名的乡建运动实验区都没有了,过去的乡建运动成一阶段。现在,我们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这是乡建运动新阶段的开始。这个学院,名义上是本会(指“平教会”——笔者)主办,实际上是有全国的乡建同志做后盾。这是我20年来最兴奋的一件事。”²³在这坚强的后盾中,可以说,最突出的当是卢作孚了。

卢作孚作为中国现代航运事业的开创者,毛泽东说他是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不可忘记的人;卢作孚被选为重庆十大历史名人,自然是重庆人民不可忘记的人;卢作孚被誉为北碚开拓者,更是北碚人民不能忘记的人;卢作孚为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做出过重大贡献,也应是西南大学莘莘学子不能忘记的人。

(原载《北碚》1997年第7期,2012年11月增修)

(责任编辑 张晓华)

¹⁹ http://hnrb.hinews.cn/html/2009-09/21/content_160424.htm。

²⁰ 曾永臧.学习晏院长的艰苦俭朴的精神[A].晏阳初纪念文集[C],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130。

²¹ 1950年卢作孚与晏阳初信函往来影印件.卢作孚研究,2010年第1期。

²² 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编委会等编.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C],重庆:西南师大出版社,1992.155。

²³ 马秋帆等编.晏阳初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38。



侯光炯纪念馆坐落于西南大学共青团花园的北面,东望科技大楼,西接蚕学宫。在宽阔的科技广场和雄伟的蚕学宫的映衬之下,这栋三层的青砖灰瓦小楼显得那么不起眼。然而这栋不起眼的小楼却承载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雨,这里曾是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室的所在地,也是侯光炯院士生前长期工作的地方,它见证了侯光炯等老一辈科学家一步一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科学体系的艰辛历程。今天,这栋不起眼的小楼正凭借着它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博大的人文情怀向世人述说着它的古朴与厚重。

侯光炯院士是著名的土壤学家、农业教育家,是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我校引以为傲的学术大师,侯老治学严谨、敬业勤奋,为土壤科

学事业奋斗终身。90多年来,侯光炯院士苦心孤诣,自强自立,不囿于书本知识,密切联系实践,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把土壤学研究与众多学科研究相结合,把机理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把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与发展科学技术相结合,长期驻扎在农村、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科学的研究。他倡导的自然免耕法不但在科学的研究上具有开创意义,而且为当地人民带去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侯老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壤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农业土壤学发展史上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农业土壤学开拓和发展的风云。侯老的卓越不仅在于他的科学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在于他的学术思想和自强自立精神已经并将长期给予后辈深刻的启迪和教育。侯光炯纪念馆正是为了纪念这位在中国土壤科学研究及教育中有着重要地位并为我校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而修建的。

侯光炯纪念馆的变迁

侯光炯纪念馆是由光炯楼改建而成的。光炯楼原名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建成于1958年,是中国科学院专门为著名的土壤学家侯光炯院士建

侯光炯纪念馆
田纪云

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为侯光炯纪念馆题写馆名

校史校情

造的研究室。当时侯光炯院士是西南农学院土化系的一级教授,正全身心地进行土壤学方面的研究,修建这个研究室就是为了改善侯院士等人的工作条件,发扬侯院士的学术思想和科研方法。“文化大革命”中土壤研究室遭撤销,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土壤研究室得以恢复并进行了适当的修缮。1985年,学校新建、扩建科研机构,将土壤研究室改为土壤肥力与免耕研究室。2007年,为了纪念侯光炯在土壤学方面的卓越贡献,弘扬侯光炯“实践创新、造福民生,精心教书,诚心育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西南大学又将土壤肥力与免耕研究室命名为光炯楼。为缅怀和传承侯老科学精神,激励更多的科技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学校决定将光炯楼改建为侯光炯纪念馆。2008年档案馆开始筹建侯光炯纪念馆,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侯光炯纪念馆的布展工作。而侯光炯纪念馆也于侯光炯院士逝世16周年之际(2012年11月4日)正式开馆。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为侯光炯纪念馆题写馆名。

其实早在1997年,原西南农业大学就在南区行政楼三楼开辟了一间侯光炯展览室,但面积比较小,只有几十平方米,展出的实物十分有限。新建成的侯光炯纪念馆共三层,面积扩大到800平方米,而且征集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所以在内容上也更加充实和完善。现在馆内的总体布局是:一楼为办公和文物修复区,二楼为矿物、岩石和土壤标本展示区(包括

1个矿物标本陈列室、7个土壤标本陈列室),三楼为侯老生平事迹展示区。

矿物、岩石和土壤标本展示区

矿物、岩石和土壤标本展示区主要展示了部分土壤、矿物、岩石标本和图片资料,旨在让人们了解土壤科普知识的同时睹物思人,把侯老一生执着追求的土壤事业和其科学研究精神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主,土以岩为根”,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人类—土壤—岩石之间的关系。土壤是岩石经过风化过程和成土作用的产物,母岩的类型、地貌特征、地质发展史等决定了土壤的特性,要研究土壤就需要了解组成地壳的岩石和矿物的性质。矿物标本陈列室展示了大量的矿物和岩石标本,包括含氧盐类、氧化物与氢氧化物、卤化物、自然元素、硫化物五大类矿物和岩浆岩、变质岩和沉积岩三大类岩石。标本陈列室里装有一台查询机,可以详细查询每种岩石和矿物的组成、性质及用途等,同时还可以播放一部分与地球知识相关的视频资料。另外还有一部显微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薄片的微观性质,并能显示在显示屏上,还可以进行微观照相。

不同的岩石在不同地理位置,受不同气候影响,经过风吹雨淋的侵蚀和耕作,形成不同的土壤。土壤

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通过研究土壤这个最普通的物质来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是侯老一生的追求。侯老生前对全国主要土壤类型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特别对紫色土和水稻土作了重点研究。侯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紫色土的研究,他在北碚鱼塘湾建立了研究紫色土肥力的“土壤保肥试验场”,系统地研究古气候等宏观因素在紫色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在考察了各种酸性紫色土、中性紫色土、碱性紫色土和紫色水稻土等的性状及其形成的机理后发现,四川各地的紫沙岩层在风化发育成紫色土的过程中,其发育方向,受水文地质即岩层淋溶程度的影响相当大。其成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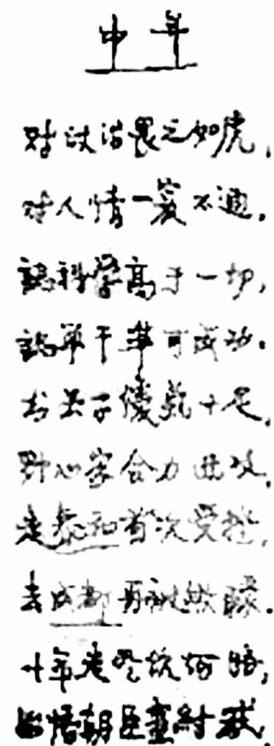
矿物标本陈列室

后的酸碱性与保水保肥能力，除与岩层母质本身的成分有直接关联之外，也与其在风化发育过程中所受淋溶程度有极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后来所创立“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的最初灵感就来源于此。此外，侯老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水稻土的人之一。1935年，在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上，侯老首次提出“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类名称和水稻土形成的“三育”（即淹育、灌育、潜育）理论和特征，并对水稻土的发生、层次形态划分，特别是水稻土层次形态与生产力的关系，作了科学论述，填补了水稻土在世界土壤分类体系中的空白。此外，侯老对山地土也有一定的研究。通过对川康一带的土壤进行调查，侯老就荥经、雅安和天全之间的大片山地草甸土的开发利用，汉源乌斯河磷矿的前景预测和飞仙关的紫色土及山地黄壤、黄棕壤、暗棕壤的土质特性及开发利用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受到当地农业干部的热烈欢迎。

矿物、岩石和土壤标本展示区不仅对紫色土和水稻土作了重点介绍，同时对经度、纬度以及区域性土壤也作了简要的介绍，在突出侯老与土壤关系的同时，又对土壤的一些基本知识进行普及。矿物、岩石和土壤标本展示区充满了科技气息，将时代性、科普性、教育性、趣味性融为一体，使参观者不仅可以了解侯老在土壤科学方面的贡献，还可以直观地了解矿物、岩石和土壤的相关知识，起到了很好的科普教育与宣传效果。

主题展厅

来到三楼，进入序厅后首先映入眼睑的是侯老的汉白玉雕像。雕像目光深邃，向着远方，仿佛在思索着什么。雕像后面是对侯老的简介。此外，序厅中还有一本电子书，里面有几十张精选出的照片，形象生动地从多方面反映了侯老的工作与生活状况。从序厅往左走就进入了主题展厅。主题展厅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强国富民、矢志不移”、“独辟蹊径、探索奥秘”、“精心教书、诚心育人”、“情系三农、躬身实践”、“奉献如土、劳作似牛”、“高山仰止、风范人间”。



1939—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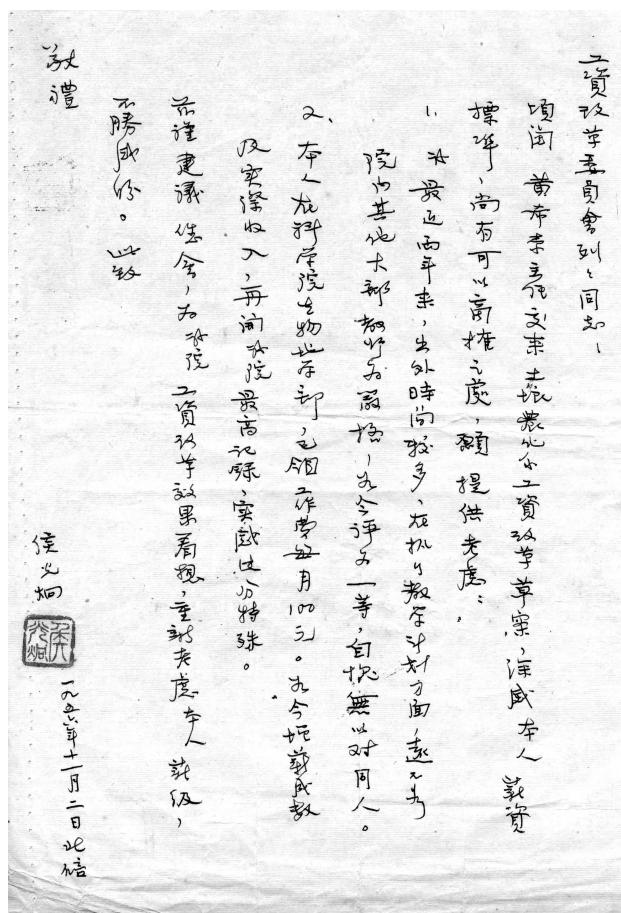
北碚—恭和—三七古—成都

侯光炯自题诗¹

这六个部分分别从立志、在土壤科学方面的贡献、在教书育人方面的成就、长期扎根农村服务三农、无私奉献和精神永存等方面多角度地反映出侯老的贡献与精神，展示了侯老在土壤科学研究和教育中的奋斗历程和丰功伟绩，体现了侯老一生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学行天下、服务苍生的精神和作为一代宗师，学界楷模的人格魅力。展厅里陈列着从1000多件藏品中精选出的200多件藏品，内容丰富多彩，既有丰富的图片，也有珍贵的证书、证件、资料，还有一些侯老生前用过生活用品，包括院士证书、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请柬、自题诗、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入党日记、要求降低工资的信等珍贵实物。其中特别感人的是那封要求降低工资的信。那是1956年，侯老被评为一级教授，工资也随之上涨。土壤农化系主任黄希素将这个情况告诉了侯老，他听了不但不高兴，反而心情沉重，立

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22。

校史校情



1956年，侯光炯向领导写信，要求降低工资等级²

即向学校领导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于是便有了这样一封主动要求降低工资的信。侯老不仅主动要求降低工资，而且他的稿费大部分交了党费，剩下的都交给学校或接济群众，自己始终按照最低标准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残酷的审查和批斗，每月交的党费仍达200元，十年动乱中仅党费就交了一万七千多元。侯老的所做所为不禁让人心生敬佩。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白马村村民为侯老建立的衣冠冢。当年侯老在此考察时，白马村这一村名让侯老想起了被称为“白马将军”的先祖，从而流露出了将来想长眠于此的想法。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侯老去世后，当地人自发为侯老修建了衣冠冢，并在墓碑

上刻下了侯老的生平，装上侯老的照片，以寄哀思。

主题展厅中还有一组幻灯片，以“大天大地大课堂”为主题，通过几组照片反映侯老“长期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精神。另外还有一个足迹图，以沙盘形式并结合声、光、电等多种现代化手段，从一生履迹、科学贡献、躬身实践、桃李天下四个方面直观地展示了侯老的履迹与成就。在主题展厅的左侧，还有一个实验场景还原和一个生活场景还原，这两个场景还原通过情景再现方式，还原了侯老当时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基调，呈现侯老的精神风貌。在序厅的右侧是一个媒体陈列室，展示了以报纸、图书为主体，含电影、电视、宣传画册在内的各类媒体资料，突出侯老的社会影响。

整个主题展示厅以“迎着泥土的芳香，走近院士”为基调，突出“泥土”这一元素在展厅中的特殊作用，以照片、沙盘、实物、岩矿石和土壤标本等形式并结合现代化手段从多方面展现了侯老的学术特质及品格，彰显了中国土壤科学奠基人的伟大贡献。

侯光炯纪念馆的建成，为继承与发扬侯光炯学术思想、教育思想提供了平台，对延续侯老业绩、传承侯老精神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侯光炯纪念馆通过展示侯老各个时期工作和生活的文物，达到纪念、景仰、学习的目的，同时还可以利用侯光炯纪念馆馆藏文物开展相关的科学普及工作，并为校内外的研究者提供资料查询和信息检索服务，充分发挥学校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和校史文化在学校发展和教书育人中的独特作用。我们相信侯光炯纪念馆必将成为学校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教育场所，成为在校大学生、校外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的重要基地。

(责任编辑 马静)

²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HGJ-SW1213-1.0049。

最后的呼唤 永远的微笑

——悼良师、挚友侯光炯院士

□文/刘秉臣

深秋，秋雨霏霏，一片片枯叶从古老苍劲，虬枝丛生的榕树上，悠悠忽忽地飘落在泥泞的山道。

秋色冥冥，苍凉萧索。



永远的微笑¹

那是侯老临终的前一天。一大早我赶到西南医院去探望他，侯老一动也不动地昏睡在病床上，只有口半张着，艰难而沉重地在吸气呼气。望着他那张因晚期肺癌、癌性胸膜炎、肺心病和广泛粥样动脉硬化等多种致命性疾病折磨得焦黄、枯瘦而憔悴的脸，我的心感到一阵悲楚，痛苦得紧紧地收缩起来。

半个月前，我与向仲怀校长相携同去长宁县接他回重庆住院检查治病时，虽然他显得精神萎顿，但是见到我们后还是很高兴。我们俩人仍像多年来每次见面时那样，相互调侃打趣一番，他乐得嘻开没有牙齿的嘴开心地笑了，甚至还举双手表示认输和告饶，引得免耕所老老少少几个人和司机周华都惊诧得张大了嘴，又忍不住抿嘴乐了。傍晚，我们俩人又愉快地谈了半个多小时，还一起回忆了文革初期我

们关在同一个“牛棚”里的情景……没想到才不过半个月光景，他就被病魔折磨得气息奄奄。

侯老的女儿二平和绮碚告诉我，10月22日入院后，进行了身体全面检查，到28日病情开始恶化，31日以后，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已不能讲话，但别人对他说的话，他多少还能听得见，心里也有些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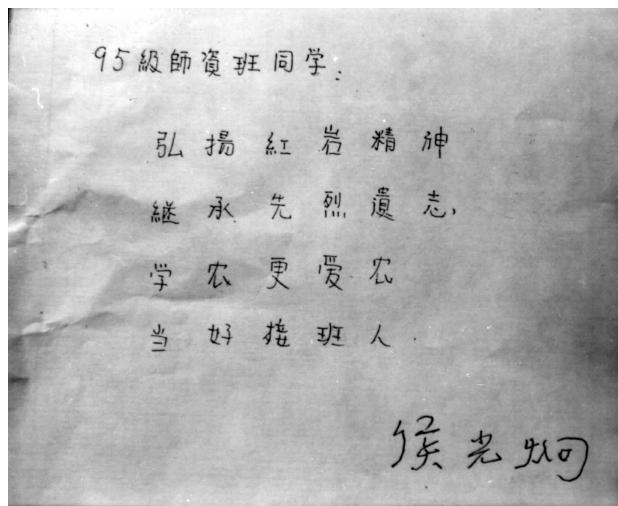
武丽华俯身对他说：“阿爸，刘老师看您来了。”侯老慢慢睁开昏暗、迟钝的眼睛，定睛看着我，似乎在苦苦地思索什么，突然，他的眼里闪过一丝亮光，很清晰的喊出了我的名字：“刘……秉……臣……”接着，有些艰难的但仍然像往常我们在一起时那样，开心地笑了笑。这是他不能讲话的几天来第一次清晰的说出的三个字，也是他告别人世前能清楚地说出的最后三个字。

他那迷茫，恍惚的眼神里，再次掠过一丝激动的神色，嘴唇微微地动了几动，似乎还想与我聊几句什么，但又力不从心，说不出来，眼神一下又变得黯淡、凄凉。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抽了一鞭，禁不住颤栗起来。我忍住内心的悲楚，强笑着对他说：“老先生（这是多年来我对侯老习惯性的称呼）好好安心养病。我去长宁接您时，答应过您，过几天，等您的身体稍有恢复，我一定送您回长宁，还要天天陪您去坐茶馆，我们俩个还有好多龙门阵没摆完，您也还有好多研究工作没做完……”他脸上流露出会意然而有些凄楚的神情，吃力地点了点头。

接着，我又告诉他，我已经开始对同学们作了关

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侯光炯院士\1 侯老专题(一)。

校史校情



为 95 汽拖师资班的同学题词²

于介绍他的专题报告，同学们深受感动，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95 级汽拖师资班的同学给他写了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赠言与鼓励，我代他拟了几句题词：“弘扬红岩精神，继承先烈遗志。学农更爱农，当好接班人。”如果他同意，请他点点头，由二平代他签上名。他听完我的话后，缓缓地点了点头，目光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萧索之意，最后一次对我温馨而又略带伤感地笑了笑，就疲惫地合上了他那充满睿智、阅尽人世沧桑的双眼，头歪向一边，又昏沉沉地睡去。

睡吧！侯老。好好地睡上一觉，您太累、太疲劳了。自从六十五年前那个春天，为了实现“建立中国自己的农业土壤学”这个神圣的理想，您义无反顾地踏上中国农业土壤学这片遍地荆棘的荒原，半个多世纪以来，您无怨无悔，风雨兼程地在这条崎岖的科学小路上艰辛地攀登，苦苦地求索，从少年直到白头。您一直没有能好好地休息，睡一个安稳的觉。

真希望能像 20 年前在上海、德州，您与胃癌作顽强拼搏时那样，守护在您老身旁，并伴您健康地回到研究岗位上。

怎么也没能想到，侯老自那一刻闭上双眼后，竟成永诀。再没有醒，永远也没有再醒过来。次日（1996 年 11 月 4 日）凌晨 6 时 50 分，与世长辞。

侯老弥留前对我的最后呼唤，是他对朋友、对亲人、对他热爱的生活、对往事的最后的呼唤。它深深

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黯然神伤，感到一种揪心的悲怆。

冥冥中，我能听见他颤动着嘴唇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

我能读懂他最后望着我时那亲切而又带着无奈和伤感的眼神所表达出的意思……

“苍天啊！怎么不再给我几年时间。我还有那么多研究工作没做完啊，《紫色土》这本凝聚了我 50 年心血的论著才刚刚动笔；《免耕治土》《生态防洪》这些重要课题的研究还待继续深入进行；三峡大坝明年合龙，而长江还是千疮百孔，水土严重流失……为什么不再给我一点时间……为什么？”

我的心能听见侯老气壮山河的呼喊，在高山之巅，在苍茫大地回荡……

侯老走了，安详的也多少带点遗憾地走了！这位中国土壤学界传奇人物轰轰烈烈的一生，画上了最终的休止符。

秋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远处，是谁用竹笛吹出一首古老的曲调……显得悠远而又沉郁苍凉。

在肃穆低回的哀乐声中，侯老静静地躺在象征着崇高荣誉的党旗下。虽然临终前遭受多种致命性病痛的折磨，侯老的脸还是显得那么安详，好像是刚刚入睡，嘴角挂着一丝略带伤感遗憾的微笑。

他那苍老而清癯的面容上，布满了被无情的岁月和生活的艰辛犁出的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每一条皱纹里，既记载了他研究工作的无数成就与辉煌，也铸刻下漫长的岁月中所历尽的坎坷、艰辛和沧桑。

望着这张如此熟悉带着亲切笑容的脸，我总觉得就像我们还在一起开怀畅谈，他正在打盹，用不了一回，就会突然睁开眼，抱歉地笑笑，然后，接着刚才的话题又津津有味的谈下去。

这些年来，侯老每次从外地回到学校，我们都要促膝长谈一番。我们的谈话或聊天，摆龙门阵，很随意，无拘无束，话题也很广泛，天上地下，山南海北的神侃，既纵谈天下大事、人生哲理，也有村野趣谈，当然，他谈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土壤研究工作。他在学术上有什么新的构思、想法；打算开展什么新的研究课

²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22, P51-3。

题；他头脑中不断涌动的一些刚刚萌发的想法……从“大窝栽培法”、“大三化、小三化”、“土壤类生物体”、“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说”，直到“水田、旱地自然免耕”、“免耕治土”、“生态防洪”……我真佩服这位年过八旬的老科学家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和灵感，爱因斯坦曾深有体会的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侯老的一些助手和弟子在研究工作中，常常感到侯老的想法不断在变，使他们不大跟得上趟，有人善意的打趣说：“侯老师的思想和他总结的土壤胶体变化的规律一样，有月变化，日变化。”我想，也许这正是侯老在土壤学研究中不断有新的创意，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并能够发展形成在世界土壤学中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体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真正的科学家应当是幻想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正如法拉第所说：“一旦科学插上幻想的翅膀，就能够赢得胜利。”

我不是土壤学圈子中的人，与侯老交往就没有师生、师徒关系的拘束，我们可以轻松、自在、海阔天空的摆谈、相互打趣。也许是因缘遇合，我们都是“杉木杆子做檩子——宁折不弯”的倔犟脾气，相互很投缘。因此，20多年来，我们相交甚笃，相知甚深。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在年龄上、学识品德上，侯老是我极为敬重的前辈、良师，但在个人交往上，我们也是能彼此敞开心扉，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挚友。

侯老也是个普通人，有七情六欲，有性格脾气。



根扎农村，身献农业³

他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心里有什么苦闷，烦恼，我们在一起时，他可以没有顾忌地敞开说，发发牢骚。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升斗小民，无权、无力为他排忧解难，但我是一个满不错的“听众”，就好像是高压锅的安全阀门，我能耐心地听，让他通过这个“出气”的阀门发泄心中郁结的闷气，吐出心中的烦恼和不快，消除他烦躁不安的情绪，减轻他精神上的负担和压力，我唯一能对他说的只有一句话：“太阳落山了明天还会升起”让他能话完气散，心平气顺，精力集中的投入研究工作中去。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年迈体弱多病，又长期在条件艰苦的农村超负荷的工作，生活上没能得到很好的照料，侯老的身体精力明显大不如从前。几个人在一起谈话时，往往谈一会后，他就觉得困倦，会不知不觉的闭上眼打个盹。但是，一当谈起他的学术研究时，他立即精神大振，兴奋起来，像换了个人似的，兴致勃勃，神采焕发，思维逻辑极其清晰、明确，折射出深邃的智慧光芒，苍老而清癯的脸上，一瞬间焕发出一种令人永远难忘的极其生动的神采。深为遗憾的是，我不是一个画家，无法把这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生动的神态，留在调色板上，但它却牢牢的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还清楚的记得那是1994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刚从几百公里外长宁县农村风尘仆仆赶回学校的侯老，顾不上一夜旅途劳累，打电话请我立即去他家。刚见面，还来不及寒暄问候，他就拉着我的手急切而郑重地说：

“我作了个重要决定。要去参加今年7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5届国际土壤学会。”

他沉思了片刻，又缓缓地但极其坚定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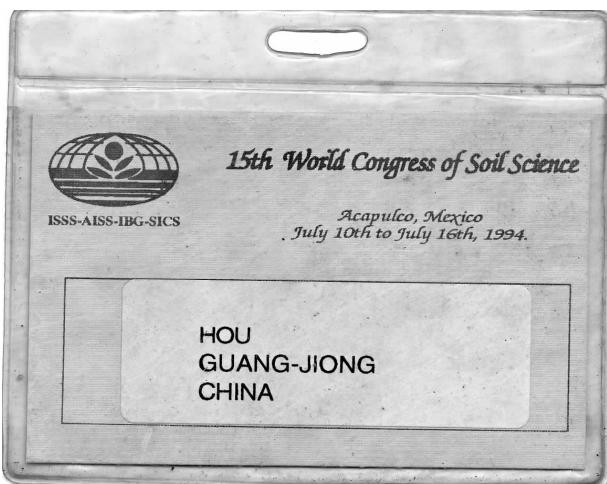
“我要让全世界土壤学界知道，我侯光炯老而未死，还在做中国农业土壤学这篇大文章。”

从这位年届90高龄体弱多病的老科学家口中说出的这几句话，字字如重万钧，掷地有声。

窗外，不知哪家的录音机传来了小程琳那清纯而又略带忧郁伤感的歌声：“今天你要去远行，正是风雨浓……山高水长路不平，愿君多保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³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22,P41-3。

校史校情



第 15 届国际土壤学会代表证⁴

侯老毕竟已 90 高龄，又身患多种疾病，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和精力，能否承受得住这样的重荷？！他的几项重要的科研课题，包括已经艰苦地开展了 14 年的《旱地自然免耕试验研究》正在紧张地进行，与此同时，他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完成送交第 15 届国际土壤学会的论文《自然免耕是消除旱洪灾害、实现持续农业的一项世界性任务》，还有那万里迢迢，远涉重洋长途飞行的劳累……

但是，我无法说任何劝阻的话，我深深地了解，土壤学研究是他的生命、他的一切。哪怕重病缠身，卧床不起，只要一息尚存，他决不会片刻停止他的科学研究。

他需要参加墨西哥会议。他要把因十年浩劫而中断了的与国际土壤学界的交流与合作重新联接起来。科学家有国籍，但是科学没有国界。他要把凝聚了自己几十年心血的研究成果，把他独创的自然免耕的理论和技术措施，通过国际土壤学界的这个最高学术论坛，推荐给世界土壤学界的同行，共同拯救我们这个星球上已被化肥农药污染，被旱洪灾害摧残得病入沉疴的土壤。这将会是中国土壤学界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为世界农业，特别是为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地区的农业和数以亿计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困人民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自 1935 年 7 月，当时年仅 30 岁的侯光炯赴英

国牛津参加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并以一篇水稻土的论文震惊当时与会的国际土壤学界的前辈、权威，到现在 1994 年的第 15 届，弹指间已过去了 60 年，沧海桑田，物移星换，如今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当年与会的国际土壤学界的那些擎天巨子，学术权威们，俱已风流云散。有谁还能料到，已年届 90 高龄的侯光炯，这位国际土壤学界世纪初硕果仅存的元老，竟能在 60 年后，又卷“土”重来，代表中国土壤学界第四次登上国际土壤学界的最高学术论坛。仅仅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土壤学界和国际土壤学界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这在全世界科学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足以令全世界的科学家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望着这位一生历尽坎坷，饱经沧桑而仍那样坚毅不屈，充满生命活力的老科学家，我还能说什么呢？！

压在他肩上的是亿万农民的期盼，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

侯老，恕我不能像小程琳歌中唱的那样“……伴

关于参加第15届国际土壤学会
情况的汇报

侯光炯 刘夜莺

1993年10月我们接到由西南农大转来的第15届国际土壤学会于94年7月在墨西哥召开的邀请书，当即于12月呈报省科委转省府批准，并按照大会必须提前预交登记费、住宿费和膳食费等的要求汇交美金1800余元，在得到批文和护照等证件后，我们二人于7月8日由上海乘飞机前往美国旧金山，随即转经墨西哥首都，次日到达开会地点ACAPULCO（墨西哥南部旅游圣地）。7月9日到达目的地，10日前赴大会登记处报到，万万没有想到，工作人员竟以没有收到1800美元的登记费为词，拒不登记（此款直到回国后向邮局和中国银行查询，才知道真正遗失了，他们答应追查，但须等候到95年元月才能得到答复），不得已只好将随身备用旅费的大部份，如数补交，才允登记，并住旅馆。以我过去4次参加国际土壤学会所经过的情况来看，这次大会出乎意料的是：会员们没有安排在大厅发言，全部采用小组报告方式，

关于参加第 15 届国际土壤学会情况的汇报⁵

⁴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HGJ-SW1112-1。0011。

⁵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HGJ-SW1212-5。133。

你风雨行……”但是,小程琳也唱出了我心中真诚的祝愿“山高水长路不平,愿君多保重……”

那天上午,侯老谈兴很浓,虽然乘了一夜火车,旅途劳累,但他仍兴致勃勃地谈了近两个小时,他老人家也真累了,说着说着,头往沙发背上一靠,立刻就睡着了。

我用一条毛毯轻轻地盖在他身上,悄悄地退出室外。小程琳那动人心弦而略带伤感的歌声,还在绿荫丛中轻柔地荡漾:“明天你要去远行,正是风雨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就这样风雨兼程。

从墨西哥归国,他向资环学院的教师传达了会议情况后,没有在家好好休息,就又匆匆赶回长宁县农村,全力投入《旱地自然免耕试验研究》最后阶段的研究工作。同时,组织力量继续进行《紫色土》一书的编写,还同步进行几项与自然免耕有关的配套技术的研究。

侯老多少还是了解自己的年龄、病情和身体情况,他似乎隐约地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对生与死,他看得很淡,很坦然,他曾沉思着对我说:“人无法改变生与死的规律,但可以把握自己生命运行的轨迹。”他焦虑、关注的是还有不少重要的研究工作没完成,他拼命把自己的研究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在与死神赛跑,想在大限到来前,尽可能多做一些研究工作,为“建立中国自己的农业土壤学”打下更深

厚的基础,为后来者铺好路。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侯老以 90 高龄的多病之躯超负荷运转。完成了用长达 16 年时间开展的水田和旱地自然免耕的试验研究,创造了世界土壤学中独树一帜的自然免耕的理论和技术措施,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开展了“免耕治土”、“生态防洪”的试验研究。有的专家认为,侯老完成的水田和旱地自然免耕的研究,是两项在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史上重要而且独具特色的研究,且操作性很强,将对全面发展生态农业,改造低产田土,改变山区贫困面貌,根治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确保未来长江三峡水库运转安全,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侯老休息、回家的时间更少了。今年春节前,学校接他回校开会。他的儿子、媳妇准备了他喜欢吃的饭菜,排好了春节几天的食谱,长孙从西北一个空军基地特意赶回家,曾孙女也欢跳着要和老爷爷一起过热闹年。但是侯老心里老是挂念将要结题鉴定的《旱地自然免耕试验研究》课题,除夕刚过完,大年初一他就要回长宁农村,家人怎么劝都不行,就打电话请我去一下。

我到他家时,侯老已让陪伴他的老陈收拾好了行李,整装待发。我进屋后笑着向侯老拱手一揖,大声嚷嚷道:“老先生,拜年的客人来了,有汤元吃没得?”他也高高兴兴的拱手还揖,嘻开没牙的嘴连连说:“有,有,你看,我没牙了,不能吃汤元,都给你留着哩。”随意聊了一会后,我对他说:“老先生,这么多年您难得在家过一个年。您看,孙子,孙儿媳妇,曾孙女都回来了,四世同堂过团圆年不容易啊!过完年再走吧。”他没吭声。我叹了口气继续说:“还记得鲁迅的两句诗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您欠他们太多了,过完年再走吧,别让儿孙们太失望了。”

侯老眼里流露出一丝痛苦、负疚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沉默了好一阵后,才沉重地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外面忙我的科研,很少回家,从他们幼年时候起,我给他们的关心和父爱的确太少了,我感到内疚,心里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⁶

⁶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8,P1。

也不好过。但是……现在……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还有那么多研究工作要做……解放都已四十多年了，还有近八千多万贫困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特别是那些边远山区的农村，看到乡亲们那一张张因生活过度艰辛，营养不足而苍老、憔悴的脸，我的眼泪往肚里流啊！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怎么对得起养育我们的父老乡亲……还有，明年三峡大坝合龙，而长江还是千疮百孔，水土严重流失，我睡不着觉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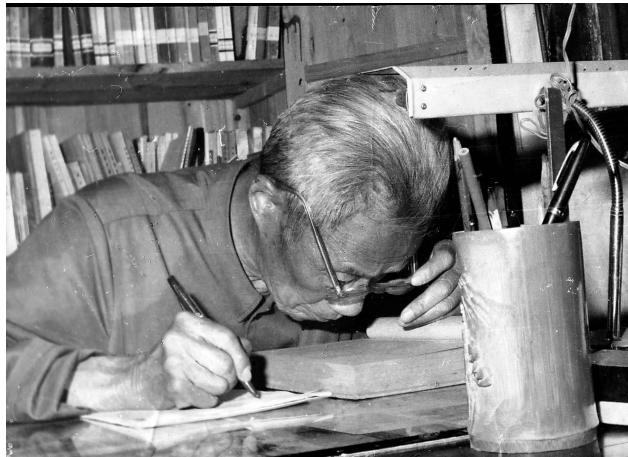
这番情真意切的肺腑之言，使我受到很大震动。在这位年届 92 岁高龄的老科学家身上，不仅蕴含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舍己为人”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而且在当前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一股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腐朽逆流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不惜牺牲个人一切，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革命情操。

我不禁肃然起敬，还能对这位可敬的老科学家说什么呢？

1996 年这一年，是侯老在土壤科学崎岖小路上艰辛攀登的第 65 个年头，是他人生路上的第 92 个春秋，也是他生命最后的岁月。

8 月 20 日，侯老告别人世前的 74 天，终于完成了历经 16 年的《旱地自然免耕试验研究》课题，通过了四川省科委组织的专家鉴定。这时他的体质已严重下降，潜伏在体内的多种疾病乘虚萌动：肺穿孔，痰中带血，胸口闷胀，胃不适，食欲减退，睡眠不好。但他顾不上休息和去医院检查、治疗，而忙着进一步开展以“免耕治土”、“生态防洪”来根治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改变贫困山区面貌的重大课题。

进入 10 月，肺癌进入晚期，并在扩散，出现大量的胸水，导致呼吸困难，气喘，动脉血管严重硬化，还出现脑萎缩的明显症状，食不下咽，夜不成眠。即使病情恶化到如此程度，他仍拒绝了宜宾地区领导和地区、县医院负责人希望他立即住院检查的建议，他忧心忡忡的说：“我还有那么多研究工作要做，哪有



耄耋之年，忘我工作⁷

时间躺在病床上休息，我的病不要紧，我考虑的是长江千疮百孔怎么办？……”辞世前半个月，他考虑的是长江三峡，是库区百万移民的生产和生活，唯独没有考虑已病入沉疴的自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以自己一生不断与厄运逆境作斗争的实践，充分证实了他自己曾说过的“人类无法改变生与死的规律，但是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生命运行的轨迹。”即使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在多种致命性疾病的纠缠、折磨下，他仍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在与病魔作殊死搏斗的同时，完成了水田和旱地自然免耕这两项中国农业史上有重大意义的研究项目，并且在病情已开始恶化，行动需人搀扶的情况下，又着手拟订他人生的压卷之作——《三峡库区生态农业区划及其建设规划》项目计划，谱写了一曲“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令人荡气回肠的人生壮歌。

但是，也正如他所说：“人类无法改变生与死的规律。”

10 月 28 日。侯老在西南医院病床上，最后审定，同意了向重庆市科委院士科研基金申报的《三峡库区生态农业区划及其建设规划》项目计划书。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 4 时，西南医院签发了侯光炯院士的“病危通知书”。

11 月 4 日。这一天，凝聚着侯老生命最后时刻的心血，并以他为项目主持人的《三峡库区生态农业

⁷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侯光炯院士\1 侯老专题(一)。

区划及其建设规划》的项目计划申请书,正式报送到重庆市科委。

也正是这一天,中国农业土壤学的奠基人,一代宗师,学界楷模,农学泰斗,92岁高龄的侯光炯院士走完了他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历程,与世长辞。

《三峡库区生态农业区划及其建设规划》项目,是侯老弥留前奉献给祖国、民族、三峡工程及库区百万移民的最后一片爱心,是侯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崇高品德最好的见证,是侯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铸造光照千秋民族魂的光辉实践。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96年11月4日。

大地之子侯光炯终于回归到他终身眷恋、相濡以沫的神州大地。

中国土壤学界和国际土壤学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凋零了土壤学的一个时代。

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好儿子,优秀的共产党员。

中国科学界,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学界楷模,一代宗师,农学泰斗。

我也痛失我永生敬重的前辈、良师和挚友。

侯老,每当夜阑人静,您弥留时对我的最后的呼



1997年3月学校党委行政召开向侯老学习座谈会⁸

编后语:

侯老自1905年诞生,几乎与世纪同寿,历经了近百年的沧桑。这位中国科学界传奇人物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农业土壤学发展史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农业土壤学开拓和发展的风云,同时也是交织着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与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两种旋律的大地之子进行曲。

本文是侯光炯院士生前的挚友和共事多年的同事对一代宗师、学界楷模、农学泰斗侯光炯院士的深切悼念。

唤,总在我耳畔回响,它让我回忆起20多年来我们亲切相处的那些难以忘怀却永远逝去了的如烟岁月。

您告别人世前,最后那温馨而伤感的微笑,将刻骨铭心的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们20多年来诚挚友谊的象征和永远的留念。

还记得吗,侯老?1990年,当您85岁寿辰暨从事土壤科研和教育60周年时,我们曾郑重其事地击掌相约,待您95岁寿辰,也是新世纪到来的神圣时刻,我们携手同登泰山,在南天门同迎新世纪的曙光,共庆您的95岁寿辰。

未曾想您就这样走了!离开了您热爱的生活,离开了您未竟的事业——您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土壤科学,离开了与您朝夕相处情同骨肉的农村父老乡亲,带走了人们对您的敬爱和怀念,也带走了您的许多未了之情。

侯老!当新世纪降临的钟声敲响时,如果那时我有幸能登上泰山之顶,我一定斟一杯您生前曾称誉过的泸州老窖特曲,洒向苍天,洒向您终身眷恋的大地,愿天地与我同饮,共祝大地之子侯光炯的英灵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静静地安息!

祖国与您同在!

人民与您同在!

大地与您同在!

安息吧!敬爱的侯老。

(本文选自西南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1997年编印的《光辉的榜样 永远的怀念》。)

(责任编辑 刘润)

⁸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侯光炯院士\1 侯老专题(一)。

导生传习制在北碚

□文/张晓华

导生传习制又名导生制，即对已识得一些字的学生加以培训，然后让他们去教那些根本不识字的人。其具体实施方法是：当前一届学生达到一定学业水平时，即可在教师的指导下对下一届学生进行教学和管理。因为这些学生在指导下一届的同时还需要继续学习，所以不称之为“老师”，而唤作“导生”。此外，这种方法区别于一般的上课，它要求“教的人，要教人习，教人用，教人传；习的人，习会了，要去用，要去传”，由此被称为“传习”。

导生制最早由 19 世纪英国传教士贝尔和兰喀斯特所创，其基本实施模式是教师先选择一些年龄较大、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充任导生 (monitor)，教师先对这些导生进行教学，然后由他们去教其他的学生。采用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可大大缓解教师奇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学生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一代平民教育大师晏阳初把这种方法运用到了教授法国华工识字的实践中，并在此基础之上加以总结，使之在后来为我国平民教育运动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导生传习制的萌芽及其在定县实验中的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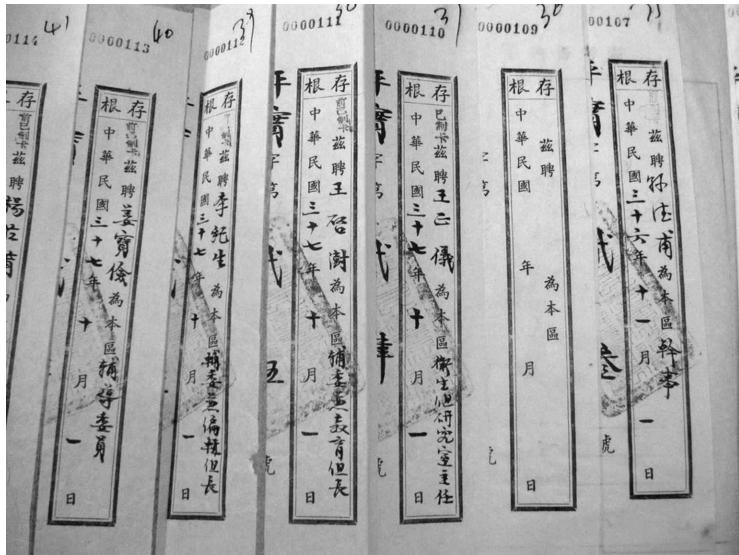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承担协约国成员的参战义务，我国招募了 20 多万工人分赴英、法战场从事筑路、挖战壕、运枪械弹药等勤务。为加强对华工的管理，军事会到美国聘请中国留学生到法国担任干事和翻译。1917 年秋，正在

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晏阳初和几个中国留学生第一批受聘到了法国，承担管理 5000 名华工的重任。这些目不识丁的华工身处异国、备受歧视，加之思念家乡，更是痛苦不已。见晏阳初等的到来，众华工纷纷前来相求写些家信。几个月后，晏阳初灵机一动，决定利用工作之余教华工识字、写信。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首先教 40 多位华工生活中最常用的、最需要的字。这些华工经过四个月的勤奋学习，很多人都能读懂军营的通告，其中有 35 位经考试合格还获得了毕业证书。鉴于晏阳初显著的工作成绩，英、法军事当局请晏阳初主持华工教育。于是，晏阳初将 5000 名华工加以编排，分成若干小组，由识字班毕业的学生去教导初学者，解决了“教师少，



定县的平民在夜校上课¹

¹ 图片来源：<http://baike.zidian tong.com/y/yanyangchu101363.htm>。

华西试验区工作人员聘书存根²

学生多”的难题。这便是后来广泛应用于平民教育运动的“导生传习制”的萌芽。

1920年，晏阳初回到中国，在各地推行识字运动。在定县开展平民教育实验时，为了有效提高教育效果，晏阳初把主要“火力”瞄准了定县农村中的青壮年文盲。当时，定县的许多青壮年文盲对接受教育都有一种畏难情绪。于是，晏阳初便采取在法国实验的导生传习制，利用已经接受过教育的学生向还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民众传授知识，也就是通过先教少数学生，再让已经学会的学生去教那些没有学习过的人。另外他还将其中成绩优秀的学生组成同学会，并给予奖励，以做榜样。晏阳初在开展平民教育的过程中，还积极创新教学法，通过使用幻灯等手段极大地提高教学效率。同时，为了创造一种活跃的教学氛围，除了相对正规的各类平民学校教育之外，晏阳初还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教学形式，通过建立读书会、举办演说比赛、公演话剧、练习投稿、开设巡回文库、编辑出版歇后语和期刊报纸等方式，吸引更多的农民加入到平民教育中去。

导生传习制度是定县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一大特色，较好的解决了定县“教师少，学生多”的困难，以一种最经济、最迅速、有计划、有组织、能持续、能自动推进的教育办法，普及了当时最急迫的男女老幼大众教育。晏阳初运用“导生传习制”在不到五年的

时间里，在定县476个村庄开办了472所平民学校，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办起了当时最好的教育。

二、导生传习制在北碚的推行

抗战开始后，晏阳初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的工作被迫转移至湖南、广西、四川等地。晏阳初和平教会的同事一面积极开展农民抗战教育团的训练，一面继续进行以县、省为单位的教育改革实验。同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为乡村工作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并在璧山（现位于重庆市境内）建立了作为学生实习场所的华西实验区。时任北碚管理局局长的卢子英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办好民众教育，1947年他特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前往北碚设立办事处，流动办理成人教育。后来随着华西实验区范围的扩大，北碚亦列入实验区范围。北碚的传习教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结合华西实验区的实际情况，晏阳初等对导生传习制度作了一定的调整。即以学校为中心，以小学生作为导生，在校内是儿童对儿童的传习，在校外是儿童对成人的传习。因为在这一模式下儿童随时都过着有组织的生活，所以又被称作组织教育。传习的内容侧重于语文，以乡村建设为最终目的，一切建设事业都通过这一制度达成，因而浓缩为口号“即知，即传，即建设”。

“除文盲”是整个平民教育的最基础的工作，它以人人识字，人人取得基本教育为目标，是实现“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的第一步。而“做新民”则是平民教育的最高目标，目的在于培养适应20世纪中国需要的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团结力、强健力”的“完整的人”。因此扫除文盲是华西实验区必须普遍开展的工作。实验区在教育工作上，积极推行导生传习制，以“传习”办法普遍实施成人教育，用以扫除文盲，推动一切建设，并指导改进国民（小学）教育，使学龄儿童尽量入学，从源头上遏制文盲的产生。

² 图片来源：<http://www.bxdaj.com/Details.aspx?id=382>。

校史校情

(一)建立传习处。首先调查北碚地区 15 岁以上、45 岁以下的文盲。初步了解了文盲的人数和分布情况后，把北碚八个乡镇按照地理形势(包括河流、山脉、交通和人口的分配)划分为 73 个社学区。每个社学区内组织有 5~10 个传习处。传习处是导生传习的基本组织，在传习处之上，有传习站、传习总站，以统领传习工作之推进。在实施时，采取传习组织附于社会现有各种组织之上，从多方面打通推进平民教育之路线。

传习场地大部分是住户的客堂、茶馆、学校、祠堂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传习教育用的教材都是免费发给，黑板由乡公所统一制作，灯油和文具均采取捐助、筹募和自助等办法解决。传习处教育时间安排，以 4 个月为一期(农忙停开)，下午和晚上均有授课，保证每日每次教学 2 小时。每个传习处都订有自己的公约，不得随意缺席，凡无故缺席的均将受团体的惩罚，但不采取政治压力推动教育。

每一社学区设专职民教主任一人，负责区内的成人教育并兼任乡政辅导工作，在社学区内辅助保长，办理管、教、养、卫等事项，其工资由实验区负担。民教主任由辅导员在当地有文化有能力的青年农民中选拔，并受辅导员辅导。每个传习处聘请导生 2~3 人，导生受民教主任辅导。

(二)招生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实验区发起了一项劝学运动，动员每个学生和成人至少要劝导一位成人入传习所学习。由于书籍等由传习所免费提供，所以入学者甚为踊跃，95%以上的人都完成了任务。每个传习处有学生约 20 人，大多是十四五岁至三十多岁的青年男女，一般属于文盲或半文盲。他们都是家庭贫穷，无力上正式学校读书，或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没有时间读书。成立传习处后，他们可利用空隙时间免费学点文化，一般都是非常乐意的。对摊贩、茶房、流动的船户以及一些因家庭缘由抽不出身的

第五表		華西實驗區各級工作人員之教育程度		38年9月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合計	男	女
合計	426	100.00	384 4 3 2 1 3 2 7 10 ② 21 189 31 1 1 3 3 3 3 2 2 42 1 4 23 4 1 1 4 2 2		
中學	5	1.18	5	-	-
專科	38	8.92	29	-	-
大學肄業	53	12.45	52	1	-
大學肄業	14	3.48	13	-	-
大文	18	4.23	16	-	-
理	4	0.95	4	-	-
學	88	20.65	80	2	-
畢	7	1.63	7	-	-
工	2	0.47	2	-	-
農	25	5.88	24	-	-
師	76	17.82	69	1	-
小	3	0.71	3	-	-
研究室	2	0.47	2	-	-
研究室	10	2.34	10	1	-
圖書室	5	1.19	4	-	-
算	21	4.93	21	-	-
本	5	1.19	5	-	-

資料來源：華西實驗區各級工作人員之教育程度

附註：已報廢者 25 人未報者 23 人未計入

华西试验区工作人员教育程度表³

人则实施特别传习，一般的做法是发放课本“自读”并由近邻处的小学生进行辅导，然后每星期由民教主任或导生进行考核。为了扩大教育效果以便迅速扫除文盲，传习处还要求学生学会的知识，向家属亲友传播，组织学习。

(三)导生的选拔和训练。导生是传习处学生学习的领导者和生活的指导人，一般都是本地人。导生不仅是传授文化知识引发自力的义务教师，也是将来组织和推动合作社工作的农民领袖。导生不仅要具有相当教学能力和领导能力，还要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并且要有服务热情。导生主要是在乡里的知识分子、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从事生产的农民中发现并培养起来的，其中也包含部分有文化的农民。所以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尤为关注访查“候选导生”。在访查后，还要由民众(户长)大会推选导生。因为是民众推选的，在招生、传习和组织工作中能得到支持，同时导生也有责任感，这样便于推进教学和建设活动的有效开展。为培养传习干部，还适时设立导生训练班，训练班的学生，部分是曾受教育者，部分是文盲。前者训练 3 个月，后者训练 6 个月，即可正式开始传习。导生的培训教材有《怎样做一个导生》、《一般教学技术》、《传、习、用辅导教案》等。

(四)传习的教材。当时学习的课本主要是平教

³ 图片来源：<http://www.bsxaj.com/Details.aspx?Id=383>。

会实验区编印的农民识字课本。华西实验区设有编辑组,与研究部的编辑组分工合作,编制了《民众应用文》(上下集)、《民众算术》《民众歌曲》等基本教材,其主要内容为农业基本知识、公民教育、卫生常识等。为了使教材更切合生活实际,平教会研究部于1948年新编了一套《农民读本》,包括农业、水利、卫生、合作、捐税、选举等内容。另外,还编了一些算术和“应用文”教材,教农民写通知、记流水帐、书信、日记、契约文据等。其中平教会编制的一种配有韵文的传习画片,以选举、合作社的兴办、地方自卫的训练、优良品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等为主题,备受广大学生的欢迎。为满足建设活动所需,对于每一建设活动都编制了一套补充教材,共编了《怎样防治蛆柑》、《怎样生小娃》、《地主不减租怎么办》等8类补充教材,除此之外还有电化教育的静片以及各种挂图等。

(五)“即习、即传、即建设”。这是实验区传习教育的口号。在实施导生传习制时,即采用传习组织附于社会现有各种组织之上,从多方面打通推进平民教育的路线。采用导生传习的方法实施教育,把“传、习、用”看作一个不可割裂的过程,一套教育活动,也是一套建设活动。例如巴县推广油桐,辅导员先召集民教主任研讨植桐的办法,民教主任回去召集社学区内的导生,传习植桐的办法,导生再回到传习处把植桐的知识和技术传给学生,传习后立即植桐。由于教育内容紧密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只要教学有方,就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改造生活的积极性。为了活跃教学氛围,吸引更多的农民前来学习,逢年过节时,传习处的学生还会整理固有的娱乐活动,对旧节目赋以新的内容,使群众得到正当的文娱享受。

(六)扩大举行国民教师假期讲习会。讲习内容除例行科目外,还有地方建设、民众教育等各类课程,以及传习教育的实际问题等。主讲人通常都是来自平教会华西实验区的,而参加讲习的人,除全局国民学校校长、教师、民教主任外,还有乡镇长、保长、保队副等。

(七)举行会议。为不断提高传习的成绩,实验区

定期举行导生会议和国民教育研究会。导生会议是农村基层领袖的一种会议,以社学区为单位,每周举行一次导生会议,互相交流、学习,从而不断提高。国民教育研究会是地方教育建设的中级管理干部会议,由乡镇长、国民学校校长、教师和民教主任组成,以乡镇为单位,每月一次,管理局和华西实验区均派员出席。

据平教会华西实验区北碚办事处统计,截至1949年10月北碚已有传习处436所,导生875人,学生12673人,扫除文盲占失学成人总数的60%。实验区当时竭力举办成人教育和促进儿童教育,使不少文盲未花一分钱就受到教育,能读书看报,能写简单信函,并学到许多与生产生活有关的科学知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导生传习制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教学形式。尽管采用这种“学生教学生,学生领导学生”的导生传习制方法一定程度上使得教学质量下降。但在当时缺乏师资和经费、失学人数过多的情况下,导生制的实行有效的解决了诸多问题。因此在当时历史条件的种种制约之下,导生传习制无疑是普及教育、组织和训练民众以及选择培养乡村领导人的最为适宜的办法之一。

参考文献:

- [1] 唐载阳.平教会华西实验区的历史回顾[C].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 [2] 曾永臧.传习教育在北碚[C].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 [3] 谭重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的乡村建设实验[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1).

(责任编辑 蔡安庆 肖艳)

为人师，孜孜不倦 为学者，兢兢业业

——记西南大学资深教授黄希庭

□文/蔡安庆

人物简介：黄希庭，男，生于1937年，西南大学资深教授，心理学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心理学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兼心理学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重庆市心理学会理事长等。中国时间心理学研究第一人，首先提出时间人格的概念，并最早把价值观引入心理学教材，为人格心理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堪称中国心理学界“泰斗级”人物。2012年9月荣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称号。



黄希庭教授¹



青年时期的黄希庭教授²

1937年，黄希庭出生于浙江温岭一个贫寒的农家，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他少年时立志要“做一个像巴普洛夫的人”。1961年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本科毕业后，他以北大高才生的身份，怀揣着知识分子的报国情怀，毅然选择了到当时以饥荒闻名的四川重庆工作，进入原西南师范学院，从此踏上了心理学研究之路，辛勤耕耘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间，黄老以心理学教师、心理学研究者的身份演绎出了一位心理学人的心理人生。

¹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心理学院网站，<http://psych.swu.edu.cn/article.php?articleid=441>。

²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心理学院网站，<http://psych.swu.edu.cn/article.php?articleid=441>。

五十余载光华,从“重庆市劳动模范”到“四川省优秀教师”,从“国家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到“国家级教学名师奖”,从“全国先进工作者”到“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重庆杰出贡献英模”……众多的嘉奖不是光环,不是头衔,而是社会的肯定,是对这位人民教师、对这位心理学家的崇高赞誉和无限敬意。

教书育人楷模：培养让自己崇拜的学生

“当好一名教师很幸福,我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培养让自己崇拜的学生。”黄老曾如是说。从教 50 余



生病期间在医院辅导博士研究生³

年来,他为国家培养了 123 位硕士研究生、58 位博士、8 位博士后、15 位国内高级访问学者等。许多学生都已经成名成家,其中有数十位教授、十几位博士生导师。他所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有一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还有一篇获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在教学工作中,黄老始终保持着高度严谨的教学态度。自参加工作以来,黄老先后为本科生及研究生讲授过自然辩证法、基础心理学、普通心理学等 11 门课程。每讲一堂课,无论是新课还是老课,他都要认真备课。以他讲授的自然辩证法课程为例,从 1977 年算起,他就写过 20 多种讲义。不仅如此,黄老的严谨还体现在他修改的一篇篇学生论文中,字斟句酌,甚至细致到标

点符号。两年前获得博士学位的陈国有说:“我们每个人都保留着入师门后的第一篇论文原稿。每一篇,黄老师都会逐字逐句地修改,笔迹有蓝色的、有黑色的,有些地方还贴有签条,这是黄老师独特的风格。”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黄老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创新观念、创新能力的培养。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引导学生揭示矛盾、提出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观念和创新能力。为了激发学生的创新观念,黄老经常出一些问题让学生去想、去学、去研究。为了拓宽学生的视野,他组织翻译了多种国外最新的优秀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由他主持翻译的有 Myers 著的《心理学(第七版)》、Solso 著的《认知心理学》、Best 著的《认知心理学》、Sternberg 著的《认知心理学》、Pervin 著的《人格科学》、Feldman 著的《心理学与我们》、Pervin 和 John 主编的《人格手册》等。目前黄老正在把他的夯实基础、培养能力、激发创新的教学理念渗透于他所主持的国家精品课程《普通心理学》的建设中。

是严师,亦是慈父,这是黄老在学生心中最深刻的印象。如果把平日里对学生学习要求尤为严厉的黄老称作“严师”,那么在生活中对学生关怀备至的黄老就应该是“慈父”。他常常叮嘱学生们要注意身体,向学生们介绍健康知识,甚至还为学生购置体育运动器材,鼓励学生们积极参加运动。谈到运动,不得不提黄老独创的“散步式教学法”。他把锻炼与学



在校园里指导学生⁴

³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心理学院网站,<http://psych.swu.edu.cn/article.php?articleid=441>。

⁴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心理学院网站,<http://psych.swu.edu.cn/article.php?articleid=441>。

习结合在一起，每天傍晚时分总要约上几个学生在西大的林荫道上，边走边谈，谈生活、聊学术，据说黄老和学生的许多富有创意的课题就是在这些谈话中慢慢酝酿而来的。另外，黄老时常询问学生的家庭情况，为贫困学生寻找勤工助学的岗位，为留校学生住房、配偶调动等奔波。而对于毕业的学生，黄老也是惦记有加，他总是叮嘱每个毕业的学生要记得把自己的生活照或是结婚生子的照片寄来给他，黄老把这些照片整理成册，时常拿出来翻看。

心理学界泰斗：从问题开始又以新的问题告终

“我不能确定将来的心理学家会持什么样的信念，进行怎样的探索。但我相信，从问题开始又以新的问题告终乃是心理学家求解人类心理之谜的必然



进行学术交流⁵

途径。”凭借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和探索精神，黄老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始终位于心理学界前列，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以时间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他主持过的和正在主持的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共有 29 项，其中有 8 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一、二等奖，出版教材、专著、译著 50 余部，发表论文 300 余篇。

时间心理学是黄老最独特的研究领域。他最先将模糊统计赋值、信号检察论、多因素实验应用于时间心理研究，开辟了时间隐喻的跨文化研究，提出了时间认知的分段综合加工模型。此外，他还发现了

Kappa 效应的年龄特征，时间判断的通道效应，心理时间的分段性和时间维度的人格特征。其成果被国外学术专著及国内多本教科书引用。1981 年，美国《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杂志，全文翻译刊登了黄希庭的《5 至 8 岁儿童时间知觉的实验研究》，标志着中国的时间心理学研究登上了与国际对话的平台。

黄老十分注重健全人格养成教育研究，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全人格概念。他认为，人格就是一个现实的完整的人。黄老的研究发现，健全人格者应该具有对世界抱开放态度，乐于学习和工作，不断吸取新经验；能以正面的眼光看待他人，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团队精神；能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自己，能自知、自尊、自我悦纳；能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追求现实而高尚的生活目标；能以正面的态度对待困难和挫折，能调控情绪，心境良好。他把价值观分为人生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人际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审美价值观、宗教价值观、自我价值观、婚恋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十大类。对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进行实证研究，根据其特点提出许多合理的教育建议，并最先把价值观引入心理学教材。

黄老从立志成为世界级的心理学者到如今的硕果累累，令人动容的不在于他曾经获得了多少奖项，不在于他荣膺过多少称号，而是他作为一代心理学人在中国心理学发展之路上留下的执着与不懈。1961 年，北大毕业的他带着他的满腔热情投身西部教育，准备在心理学研究上大展手脚。然而，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心理学受到世人批判，所有的课程都被迫停止，心理学研究更是遭到严令禁止。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黄老认为必须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抢回来。于是，他开始在家里仅有的一台缝纫机上开始了他的《普通心理学》写作。在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为了在夏天继续工作，他就打一盆凉水一边把脚泡在水里，一面继续写作。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开始出现腰痛的症状，于是他便站在凉水里，继续写他的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于中国心理学研究，黄希庭就是报以这样全身心的投入和一丝不苟的专注，至今年过七十的他仍然坚

⁵ 图六至图七来源于“窥渊斋”黄希庭教授个人网站，<http://xthuang.swu.edu.cn/?cat=1>。



中国心理学会前会长、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张侃教授代表中国科协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得者黄希庭教授颁发证书、佩戴证章⁶

持在心理学研究的第一线，为心理学发展继续辛勤的付出着。

为人师，他孜孜不倦；为学者，他兢兢业业。2012年9月，黄老荣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颁奖词这样写道“他常常漫步在校园，把聊天当作课堂。他的散步式教学，善于捕捉思想的闪光。作为心理学的大师，他研究的是人格，激荡的是心灵。”

后续：弟子们口中的黄老⁷

赵伶俐教授：“我早上起来很喜欢跑步，我早上五点半就起床。但是，西南大学还有比我更早的那就是黄老师。我每次五点半从寝室出来，就看见教师楼的那个灯光早就亮了。我就想，这是谁啊？后来，因为黄老师给我们上课，我就问他说，‘早上是不是你啊？’他说，‘对。’这么早，他比我还早，我一直以为我最早了。”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有天清晨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冲到客厅一接，然后一看是黄老师打来的。他告诉我说‘你今天开题！’，我一下子就懵了，才六点钟呢。”陈红教授回忆到。

“我的师母就曾经说过，他是研究时间心理学

的，可是他的时间观念可能是最淡的，他经常忘记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什么时候该吃药啊，什么时间该做什么啊。”秦启文教授说，“但是，他的确是惜时如金，比如说他对学生的学业啊，学术的一些结点啊等方面绝对不会含糊，他是精确到天，精确到小时，甚至是精确到分钟的。”

毕重增副教授说到：“我自认为非常满意的文稿发给他以后，过了两天，他把这个稿子拿给我看，看了以后我非常的吃惊。你看这上边，这上边改过的，这是黑色的，这是红色的，还有蓝色的，包

括贴了各种各样的指导性的条目，里面甚至是标点符号都改了。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的案头，一直到今天。”

参考文献：

- [1] 你是守望校园不熄的灯火 你是倾尽韶华怒放的生命[N].中国教育报,2012-9-10(6).
- [2] 漫漫人生求索路 书写学术新篇章. 中国教育新闻网 [OL].http://www.jyb.cn/china/rwfc/201207/t20120704_501239.html.
- [3] 朱丽亚,黄希庭.校园里不老的传奇[N].中国青年报,2012-09-24(6).
- [4] 胡光楠. 心理学泰斗黄希庭 五十载潜心育桃李 [OL].华龙网,2012-09-18.
- [5] 黄希庭. 行走于心理学巅峰的老者[J].今日教育, 2011,(01):64.
- [6] 黄希庭简介.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网[OL].<http://psych.swu.edu.cn/sort.php?sortid=73>.

(责任编辑 李天兰)

⁶ 图片来源：<http://xthuang.swu.edu.cn/?p=146>。

⁷ 人物口述：根据中国网络电视台《教书育人楷模事迹展播》视频整理。

教泽深远，功在后学——记徐德庵教授

□文/杨程程

徐德庵教授原名徐秉文，山东省临朐县人，1902年12月生。1922年进入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学习，师从著名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先生，钻研文字、训诂、音韵之学。毕业后，徐德庵先后在山东第三师范、曲阜师范等学校任教。抗战爆发后入川，陆续在四川成都中学、华西大学中文系、四川大学夜校、相辉学院文史系任教员、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后因相辉学院改组，徐德庵于1950年被西南文教部派到西南师范学院任研究员，从事考证近代俗语工作。一年后转任中文系教授，直至1984年4月逝世。



徐德庵(1902—1984)

徐德庵教授一生从事古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教学方面，他始终秉持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古汉语一般难于掌握。为了让同学牢固掌握这门课，他便经常深入学生，征求意见；上课时遇到艰深的地方，也总是想办法做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长期的教学工

作让徐德庵深感古汉语的语法研究与实际应用严重脱节。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阅读古文的能力。徐德庵认为，高等学校文科较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要提高阅读文言文能力，必须多抓语法，就像中等学校的语文教学不能不多抓词汇一样。但是单纯的讲授语法理论或是作品都无法达到目的。为此，徐德庵独自编写了《古汉语语法》和《古文语法分析百篇》等讲义，通过作品来讲解古汉语语法理论和进行语法分析，帮助学生学习古汉语语法。在《古文语法分析百篇》里，他一共选择了一百篇历代散文作品，对其中的所有语法现象都一一进行分析，这样的创举使它直到今天仍是我国唯一的一部古文语法分析专著。在徐德庵的悉心教导下，他的学生八成以上的考试成绩都达到了优良水平。因为在教学上成就突出，1960年徐德庵被评为重庆市教育先进工作者。但徐德庵并不满足于所得，随着教学实践的不断发展，他对自己编写的讲义也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和补充，以增强其实用性。于1983年所著《古代汉语语法试用教材》就是他集合以前的语法教材修订而成的成果。

徐德庵在教学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语言学领域内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解放前，徐德庵的研究重点是音韵学以及方言词汇，并在当时著名的专业杂志《国文期刊》上发表了《方言丛考》、《蜀语札记》、《“妃呼豸希”解》、《庄子连语音训》等文章，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解放以后，徐德庵适应教学需要，将研究重点转为古汉语语法。我国传统的语言学，一向缺少语法研究。徐德庵在这个新的领域里，不断探索，自创道路，取得了较前更大的成就。他发表的《近代汉语中句末语气词“则个”“者”“著”“咱”“罢”“波”》中对“者”“则个”等语气词的创见已成定论。论文《上古汉语中的系词问题》还荣获



刊登徐德庵《〈庄子〉杂篇连语音训》的国文月刊

一九八四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二等奖。成就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基本功之上的。“他的《方言丛考》，在撰文过程中，博集资料，泛采例证，选取川、陕、鲁、鄂、豫、平、津以及江、浙各地方言词近200个为例，以《说文》说解为主，辅以《方言》、《尔雅》、《释名》、《广韵》等近40部古籍的训诂材料，证明现代各地方言词中保存着许多古代词语。”^[2]仅在



徐德庵著作《古代汉语论文集》封面

研究近代汉语语气词时徐德庵就详尽阅读了二百五十本有关书籍和文章，由此可见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严谨勤勉，脚踏实地。

徐德庵沉浸在文字学数十年皆因兴趣所在和性格使然。他在青年时期就只喜欢古文，立志作一名“为于举世不为之日”的古文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之时，他对于《新青年》等倡导白话文的刊物是不以为然的，认为白话文“可不学而能”，没有价值。徐德庵对自己个性的评价是“孤独成性”，“不好说话，不好见人”。朋友也说他是一个老夫子，不多言，不多语。1946年徐德庵到重庆北碚相辉学院任教。当时他任课时数不多，学校的自然环境又颇佳，最适宜闭户进修。于是他在相辉学院任教的四年里，没请过一次假，也没到重庆一次，有时一整个学期也不过到北碚街上一次。上课之外，只是闭门在家钻研，和同事也极少来往。正是这样的兴趣与性格，才使得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做学问的人，能够常年守在案牍边，研究在别人看来无比枯燥的内容。功夫不负有心人，徐德庵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受到了语言学界的重视。1981年他被聘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顾问，并被推选为四川省语言学会理事。

徐德庵教授一生勤勤恳恳，严谨认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作过中学教员、文教干部、大学教授、文史专家，出其门下之人数不胜数，真可谓桃李满天下。所谓教泽深远，功在后学，徐教授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 [1]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于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徐德庵的人事档案。徐德庵《干部档案》正本，编号SW1006-015，内中是徐德庵先生个人在各个时期所填写的表格、履历、个人历史自述以及其它有关调查资料等文档。文中凡采自档案材料者，不再出注。
- [2] 徐适瑞.徐德庵的古汉语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6).
- [3] 《缙云山下一支歌》编委会编.缙云山下一支歌(第一辑)[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张晓华)

兴农让学子成才 科技促蚕农致富

□文/林元吉

“龙的传人不忘根”，我们的根在农村，人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都靠农村供给。“没有农村的泥腿子，哪有城里的油咀子”。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科技和教育。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农业工作者，在任何时候都要与国家和人民同心同德，使命如天，责任如山，应该把关心下一代的成长，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而勇担重任。在学校就要引导学生勤奋学习、全面发展、经受锻炼、实践成才；在校外农村更要关心广大青年农民的科技文化、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近 15 年来，我与师生常出入云贵高原、广西民族地区，穿梭在重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的 100 多个县市农村蚕桑生产教学实践基地、实施高效生态蚕业、发展循环经济，把农业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与服务送到田间、蚕房、鸡棚、菌屋、沼气池，为村社农户解决技术难点，把致富的金钥匙交给农民，播下了富农的科技种子。我先后指导农民新栽良种桑树 35 亿株，举办栽桑、养蚕、养鸡、种菌、桑行间种中药材等技术培训班 300 多次，培训蚕农、大学生干部 10 万人次，蚕农不出村社就能进入科技课堂。原来传统养蚕一个劳力养 1.5 张蚕种，采用新法省力养蚕可养 3—4 张，由原来平均每张蚕



桑林下养鸡

种产茧 22 公斤提高到 30 公斤，亩桑效益由 1800 元提高到 4000—6000 元，蚕农累计增收 8 亿元，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干部、学生常赞誉我说：“你是全国著名的蚕桑专家，西南大学的资深教授。”我回答说：“我是钻家！我是在农村钻了这家农户、又钻那家农户的‘钻家’。”

根植村社，实施高效生态蚕业农民得实惠

西南大学与石柱县人民政府县校合作，开创了高校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模式，也探索出了高校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创新的新途径。

现代农业特征是高产、优质、高效、生态、低碳、

¹ 本文所有图片均由林元吉老师提供。



在石柱县灯盏村桑地技术指导

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石柱的蚕业要转变生产方式，实施综合开发，才有生机活力。我与吴大洋教授、研究生杨春以及石柱丝绸公司科技人员多次实地考察和研究，提出了桑(蚕)——草(兔、鸡)——桑枝(菇)——蚕沙、兔、鸡粪(沼气)——沼液、菌棒(肥)——还地(菜、粮)的高效生态蚕业发展模式，由原来传统的线型发展转变为循环经济，变一用为多用、变无用为有用，合理利用资源，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减少排放污染，提高综合效益。亩栽宽行密植桑1200株，产桑叶2000公斤，养蚕3—4张，收入3000元，桑树行间种黑麦草养长毛兔35只，兔毛收入2500元，桑枝生产食用菌，一个菌棚可减少七亩杂木的砍伐，保护了森林，蚕、兔、鸡粪便产出的沼气还能解决一家农户3人的照明、煮饭问题，减少了烧柴熏烟环境的污染。沼液还田生产无公害菜、粮供应市场，每亩桑地平均收入5500—7000元，比单一栽桑养蚕产茧收入提高2倍。如石柱临溪镇年养蚕3000张，产茧87.5吨，蚕农收入200万元；桑行间种草养兔15万只，兔毛收入288万元。该镇前光村搭建了24个菌棚，用桑枝替代杂木生产香菇收入20万元。

在石柱宁城坝沉睡多年的荒滩地，新建起了300亩标准化桑园，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寒中逼出新思路，兴起鸡蚕套养，建起了年养10万只土鸡养殖场，运行良好，养的鸡肉质鲜美，已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鲜活鸡畅销沙坪坝、九龙坡、南岸、江北等主城区，供不应求。亩桑效益达6000元，年纯利100万元，保障了40多个职工的岗位，就地

解决了70位农民工的就业，为农户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石柱高效生态蚕业发展模式已在重庆、四川、广西、云南、江苏、浙江等地蚕区广泛推广。

石柱县蚕农、干部、职工高兴地说：“西南大学来石柱县校科技合作，不仅给我们带来科技，还带来了精神，挽救了石柱一个奄奄一息的产业，增加了蚕农、职工的收入”。2010年7月6日，重庆市委书记张轩常务副书记，来到石柱宇城坝蚕业示范实践基地考察时高兴地说：“在这样大片桑林下养的土鸡品质好，要扩大发展，你们尽快注册，打出石柱土鸡品牌”。

张书记还对随行人员说：“教授在哪里？林教授他长期就在桑地鸡棚里。西南大学在石柱县校科技合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在重庆市乃至全国高校都是一大特色亮点。”

把讲台搬到田间，播下科技新希望

当前农村最稀缺的资源是人才，是文化科学技术，提高务农种田人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水平至关重要。原来乡镇的干部、科技人员、农民集中在县镇进行技术培训也能收到一定的效果，然而农村生产

唱：西南大学 林元吉 教授

教坛爱民深似海，
科技讲座进山来；
字字珠玑讲技术，
誓推蚕农上高台。

忠县三汇镇人民政府 杨家祥

2006年4月28日

忠县三汇镇人民政府送给林元吉教授的赠词



在铜梁县少云镇农村指导粮蚕间作

第一线真正的种田人却受训很少，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总结了农村技术培训的经验教训，面对农业生产实际，我们组织村社的农民和农技人员，村干部以就地院坝作课堂，以生产上最需要的先进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并在桑地、蚕室、鸡棚里现场操作示范和提问回答解难，培训完后就直接在生产上应用。

2004—2011年，我先后在石柱县临溪、桥头、大歇、南宾、三星、下路、马武等乡镇培训蚕农60次，受训10000人次，提高了农民科技素质和市场竞争意识，使石柱蚕茧质量名列重庆前列。1998年—2010年，我先后深入黔江、濯水、太极、石会、黎水等20多个乡镇进行技术指导，培训蚕农2万多人次，组装了现代养蚕配套省力技术体系。2001—2011年，我在重庆的万盛、荣昌、璧山、梁平、合川等20多个县市农村，针对蚕农、科技人员进行科技演讲培训2万多人次。

培训针对性强，农民易接受，让真正种田人不出村就能学到先进实用技术，既节省了时间，又减少经费开支。促进了传统农业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新型农业方向转移，也促进了高校农科教人才培养模式，面向农村基地产学研结合纵深发展，提高了农民科技种田发展现代农业的技术水平。

能力在实践中磨炼，价值在平凡中升华

高校的中心任务是培养人才。我们遵循高校农

科的特点，坚持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引领学生深入农村基层、企业生产基地，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使学生了解乡情、体验民情、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向科技人员学习，增强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深切感受科教兴农的紧迫感，真正体验青春拥抱时代，时代呼唤人才，人才创造伟业的社会责任感。大学生们在参与这些支农实践活动中，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也养成吃苦耐劳、不怕受挫折的良好风气和心理素质。实践证明，大学生的学历只是一种凭证，而学力才是能力与实力。进而激发学生在生产实践中学习，提高对基本理论与应用能力、钻研能力、应变能力、交流能力以及创新意识等理念的培养。为此，在校地合作处、校关工委和校团委引领指导下，我满腔热情地采取多种形式积极组织大学生深入村社基层、经受锻炼、服务三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奉献，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5年7月，我带领校博士团和本科生小分队30多人，来到合川市官渡镇，师生们先后给300多名农民传授了如何养好夏秋蚕、生猪饲养、农作物蔬菜栽培、防病治虫等关键技术。第二天凌晨又带领同学们行走15公里，来到该镇的梭子村，面对院坝里100多名青年男女，就养好夏秋蚕的关键技术，作了深入浅出的讲授。该镇蒋定平镇长握着我的手说：“教授来了，蚕农笑了！我镇今年养蚕收入起码多增收50%以上。”第三天又和同学们在合川市塔耳的广场，面对200名农民、市民就养好猪、种好菜及桑树丰产等农业技术问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2006年7月，我带领农学、茶叶加工、食品、机械、人文等专业的云南学生20多人，先后在云南中缅边境的永德县、临沧市少数民族山区农村的田间猪舍、鸡场、茶叶加工厂，对边贸等产业进行实地考察，先后面对300多名农民，对农业、茶叶、中药材的发展进行了讲授，受到干群的好评。

2007年春，我带领蚕学、生物技术的本科生、研



师生在北碚区天府镇农村养老院对蚕农进行养蚕技术培训

究生、日本留学生共 15 人，在北碚澄江镇转龙村优良蚕种繁育生产基地，师生分别与 50 多名蚕农就养好原蚕、提高蚕种繁育质量等关键技术进行了讲解和交流，增强了蚕农养好蚕的信心，也提高了学生理论与实践的应用能力。同时又在澄江镇政府门前，挂起栽桑养蚕科技图表进行科技赶场，面对 100 多名农民，就养蚕消毒防病等技术难题进行讲解，受到欢迎。

现身说法，启迪奉献

2007 年 7 月，面对西南大学资环学院应届毕业生党员 150 人，我着重讲述了自己为农业发展和蚕农增收，常深入农村，“把吹风当打扇，把落雨当流汗，一天当两天，晚上当白天”，不厌其烦的把技术难点传授给农民兄弟的经历，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2008 年 10 月，面对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 100 多位新同学，我以“科学规划、实践成才”为题，讲述了我 50 多年在蚕业高等教育、科研的实践与探索，长期深入农村为祖国蚕丝产业发展，为蚕农增收洒汗的事例，会场上不时暴发出热烈的掌声。我风

趣地说：“没有不好的专业，七十二行，行行重要。”勉励学生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实践成才、事业有成，激发起同学们热爱所学专业，奋发学习的热情。

2010 年 9 月 16 日下午，我受邀参加在石柱召开的西南大学支教交流会，与 16 名在石柱各中学支教的研究生志愿者交流。我深切地询问同学们的境况，表达对支教同学的关心，动情讲述我在高校 50 多年的人生经历，并语重心长地激励他们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科技兴农贡献自己的力量，使他们深受鼓舞。支教同学们

纷纷表示，会以前辈为楷模，把青春挥洒在石柱这片宝贵的土地上，为石柱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为自己的人生添一抹动人的色彩。

阳光总在风雨后，喜迎四方贵客来

我在科教兴农新农村建设，关心青年大学生的成长中做了一些事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领导、群众和媒体的关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重庆日报、重庆公民报、重庆晨报、西南大学报等媒体先后以《晚霞映红了田野》、《走在巴山蜀水间》、《把文章写在大地上》、《蚕农心中的明星》、《钻了这家钻那家的“钻家”》、《古稀教授走乡串户传授养蚕经 22 年》、《晚霞映红了桑园》等为题作了报导。我也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农业科技服务工作者、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科技扶贫个人、三下乡先进工作者、重庆市首届科普先进个人、西南大学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责任编辑 刘润)

从“小猪倌”到“鹅司令”

——记大学生回乡创业模范邓费建、邓波兄弟

□文/熊晓汶

编者按:“2006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晚会上，主持人朗声念道：“才下课堂，又上猪场，几多执着，几许悲怆。心田种下诚信，信念收获希望；贫穷不是羞耻，男儿应当自强。在复杂的目光中，他们赢得了尊重，展示了功劳——他们不愧为重庆学子的骄傲！”这说的就是西南大学(荣昌校区)的邓费建、邓波兄弟，两个边上学边养猪的自强学子。他们悲壮的故事、果敢的行为、坚强的意志、远大的理想，感动和激励了无数当代的大学生。

从西南大学高材生到猪场“小老板”，从默默无闻的贫寒学子到2006年“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从“小猪倌”到“鹅司令”，邓费建、邓波兄弟俩勇敢创业、努力打拼，用汗水在农村的广阔大地上开出了一簇灿烂的青春之花。



荣获“2006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的邓费建(右)、邓波(左)在接受采访¹

一、读书与喂猪兼顾，贫困与坚强共生

(一)“双喜临门”却忧心忡忡

2004年，重庆市荣昌县吴家镇的一户农户家里“双喜临门”，因为家里的邓费建、邓波兄弟俩同时考取了西南大学，本应是一桩天大的喜事，却让邓家高兴之余也忧心忡忡。原来，邓波的父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基本丧失了劳动力，为给父亲治病，家里已一贫如洗、债台高筑。后来找亲戚和左邻右舍借，好不容易凑到四千元钱，却连一个人的学费都不够。新生报到那天，兄弟俩一人拿着两千元到学校报到，向班主任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最后靠着三万多元的助学贷款，兄弟俩才同时迈进了西南大学荣昌校区的门槛。

(二)生活举步维艰，萌生创意当“猪倌”

深知父母供自己读书的不易，兄弟俩学习非常

¹ 图片来源：2007年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网回顾感动“自强学子邓费建、邓波”(http://www.cbg.cn/zhuanti/gdcq2007/2007-10/25/content_28447.htm)。

刻苦，多次获得学校各种奖学金。为了多挣点生活费，兄弟俩大一就开始勤工俭学：推销地板、销售饲料和同学一起创办养兔场，甚至过年都不回家。就这样大学生活虽然艰苦，也维持下来了。然而到了2006年7月，重庆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干旱，家庭的压力一下增大了，生活费成了一大难题，兄弟俩决定加大勤工俭学力度。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让他们的经营头脑得到开发，有了经验积累的他们，跃跃欲试，想伺机到茫茫商海中打拼几番。于是，学习动物医学专业的哥哥邓费建提出了一个建议——开办养猪场。

2006年上半年，生猪价格下跌，市场低迷。兄弟俩到学校附近的一个村做调查，发现村里原来有500多头母猪，已经卖掉、宰杀400多头。“下半年，猪价一定上涨。”他们的判断，得到老师的认同。但是邓波的班主任却十分担忧“不说有没有能力办好养猪场，万一亏了，岂不是雪上加霜？”兄弟俩却说：“做好了，是家庭也是我们自己人生的一个新起点；做亏了，就当积累经验，也亏不了太多，几年就能挽回损失。如果能够做好，能够赚钱，另外也可以巩固自己的专业知识。”终于，班主任同意了他们的计划，还帮助他们联系学校食堂，把准备倒掉的剩菜剩饭转让给他们做饲料。

(三)养猪几多险阻，破釜沉舟不畏惧

2006年6月，邓波兄弟俩开始积极筹备养猪计划。恰巧学校附近的一个旧猪场正对外出租，兄弟俩便以2000元的低价包下了猪场。可在别人眼里，兄弟俩的行为有点不务正业甚至是舍本逐末。有村民说：“要不得，养猪怎么学习呀？”有同学说：“一个大学生还要出来养猪不读书，挺没有面子的。”别人的非议还可以忍受，最让兄弟俩感到苦闷的是，他们的这个想法竟让一向慈祥的父亲大发雷霆。父亲认为“别人会耻笑我，拿钱去给两个儿子读书，结果却来养猪，这个让人听着不大高兴。”而且当时家里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来开猪场，兄弟俩打算借三四万元的外债，这个冒险的计划把父亲气得心脏病都复发了。

父亲的病发，让兄弟俩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但要放弃养猪的计划又实在不甘心。最后他们决定先把



邓费建(左)、邓波(右)正在养猪场给猪喂食²

养猪场偷偷经营起来，再慢慢说服父母。身无分文的两兄弟面临的一个难关就是整修场地。原来低价包下来的猪场很多结构设施都需要改进，两个人利用暑假时间在猪场里苦干了整整半个月，手上磨出了血泡，脚也被铁钉穿了，虽然辛苦但花费不多，兄弟俩还能应付。但接下来引仔猪的一大笔钱该从哪儿来呢？他们思来想去，还是只能跟亲戚去借，不料却阻力重重。邓波说：“当时很多人就认为，我们拿到钱以后，可能会没有打算，或者说乱花掉，对我们不信任。”引猪仔的资金没得到解决，偷偷修整猪场的事却又让父母给发现了。就在兄弟俩觉得希望要彻底破灭时转机出现了，父母的想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父亲说：“他两弟兄办这个猪场的事情，是为了给他妈妈减轻负担，为了找钱来给我治病。我想一想，你再控制他两弟兄，你作为一个老的来说，也有些太对不起他们。”于是父亲主动提出和母亲一起搬到猪场帮忙照料，而且还出面跟亲朋好友借了四万多元钱。有了这笔资金，兄弟俩以每斤两元左右的低价一口气引进了一百一十八头仔猪，准备放手一搏。

从大学生到猪场小老板，兄弟俩很快适应了角色转换，每天在学校和养猪场两点一线之间奔波，忙碌而充实。因兄弟俩分别学习动物医学专业和动物科学专业，他们实行分工合作，哥哥负责疾病预防，弟弟负责饲料运输和喂猪，由于学习和工作时间冲突太多，他们还雇用了两名工人。猪场采用兄弟俩在学校学习的科学饲养方法，喂猪一不用费时费力地

² 图片来源：搜狐新闻“大学生‘猪倌’入围年度新闻人物30强”(<http://news.sohu.com/20070110/n247516699.shtml>)。

校友天地

煮猪食,二不用清扫大量的粪便,大大节约了时间和人力。经过精心照料,猪养得既结实又毛色好,长得还快,兄弟俩也实现了学习、养猪两不误的最初构想。

然而好景不长,2006年11月初,一场严峻的考验降临了——养猪场有近五分之一的猪相继病倒了。病猪出现高热,全身发红的症状,烧降下去以后马上就升起来,反复无常的。兄弟俩这下慌了神儿,他们发现自己两年多的畜牧兽医专业好像全都白学了,竟然连猪的病因都查不出来。眼看着猪一头头倒下去,自己却束手无策。最后他们想到了向老师求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兄弟俩用三轮车把一头病猪拉进了学校,这一举动也吓坏了老师,“教了几十年的书,还是第一次看见学生把猪抬到课堂上来。”虽然吃惊,但是看到情况紧急,老师还是马上在课堂上给猪做了检查,并亲自去猪场里为其余的病猪一一诊治。这一诊治才发现,原来是弓形体病,而普通的抗菌药对这种病起不到任何作用。在老师的指导下,兄弟俩使用了专门的磺胺类药物才控制了病情,二十几头病猪总算是有惊无险。

此后,兄弟俩一遇到问题,在学校就向老师请教,在养猪场就去找养猪农户交流。兄弟俩有了一个共同的体会:专业理论、养殖技术和管理知识都得到了增强。更值得高兴的是第一栏肥猪出栏卖了个好价钱,扣除成本,净赚一万多元,兄弟俩也因此解决了生活费的难题。

慢慢的,兄弟俩的事迹在学校流传开来,影响力不断扩大。2006年兄弟俩荣获了“2006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的荣誉称号,并和孟二冬教授等人一起被评为2006年“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先进事迹相继被多家媒体报道。之后,兄弟俩又获得了第十一届“重庆青年五四奖章”的殊荣。读书与喂猪兼顾,贫困与坚强共生,在复杂的目光中,他们赢得尊重,创造希望,在无数大学生心田种下坚强的信念。

二、回乡当“鹅司令”,青春在乡村奏响创业之歌

(一)婉拒机关工作,回乡艰苦创业



为扩大肉鹅养殖量,邓费建(中间)、邓波(左)和员工一起动手搭建养殖棚³

2007年,在兄弟俩即将毕业之际,荣昌县领导在慰问邓费建兄弟俩时表示,荣昌的发展需要这样自立自强的人才,欢迎他们到县内机关工作。但兄弟俩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想将大学所学知识用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于是婉拒了县领导的好意,回到距离荣昌县城40多公里的吴家镇农村老家,自己创业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不同的是兄弟俩不再养猪转行开起了养鹅场。

兄弟俩考虑到家乡荣昌县原本就是中国畜牧科技城所在地,荣昌的卤白鹅在全国也相当有名气,然而在荣昌养鹅的却十分有限,用于做荣昌卤白鹅的商品鹅基本上都是依靠外县供应的。于是,兄弟俩决定抓住这个商机,同时希望将家乡本土的特色做大做强。更幸运的是,一位名叫钟明金的台湾客商从电视上看到邓家兄弟的事迹,被他们的创业精神所打动,主动提出想要与他们合作。经商议,由钟明金与邓费建兄弟首期共同投资15万元修建存栏量1400只的肉鹅养殖场。以后钟明金陆续予以资金支持,邓氏兄弟则以“技术入股”方式共同经营和扩大养鹅场。

有了启动资金,加上一些同学的帮忙,兄弟俩便积极投入到了养鹅场的建设中。据邓费建回忆,当时的鹅场是他和同学手把手建起来的,资金吃紧请不起搬运工人,建筑材料就由自己搬运,砖自己扛,水泥也是自己推。最开始没有宿舍和厨房,就只能睡在鹅舍旁边,等养殖场建好的时候,他足足瘦了5公

³ 图片来源:新闻资讯网创业天地创业案例“‘大学生猪倌’毕业回乡再创业”(http://dg.edutt.com/book_html/123110.shtml)。

斤。虽然辛苦,但养鹅场很快就建起来了,购买幼鹅后兄弟俩又立即投入到了养鹅场的运营中。

(二)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第一年按照兄弟俩最初的设想每年销售商品鹅20000只,两年之内就能收回成本并盈利,而年终时一结算,情况并不乐观。第一批鹅有22000只,就是不算他们个人的人力资本投入也净亏了2800多元。



邓费建(左)、邓波(右)兄弟俩在养殖场给肉鹅喂食⁴

2009年,是养鹅场极其艰难的一年。市场不景气,合伙人撤资,银行负债20万元。是放弃还是坚持,兄弟俩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执着而坚毅的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据邓费建回忆,当时他们吃了一个月的南瓜,吃了一个月的冬瓜,而这些都是乡亲们送的,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感恩的同时他们也一边改善经营方式一边改良养殖技术,兄弟俩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总结出一套秧苗饲养的成功经验。在养殖场里有一排排喂水器,兄弟俩说“以前养殖场都是用碗来喂鹅,要人工加水又费时又费力,后来看到了喂鸽子的喂水器觉得可以应用到喂鹅上,便购置了喂水器,这样不仅省时还很清洁,很好的扼制了鹅消化道上的一些疾病。”养殖场里每个细小环节都可以看到兄弟俩的用心。“创业的艰难,比在上学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邓费建说,“但是,我们的另一种收获却是难以用金钱衡量。”与在学校的时候相比,邓费建少了些许稚气,多了几分沉稳。在他的身边,已经集聚了8个人,除了和自己一起在学校创业的弟弟邓波,还有另外5名学畜牧专业的校友

以及聘请的一位工人,8个人分工合作共同打理养鹅场。

(三)为大学生创就业平台,带领全村人民共致富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年兄弟俩销售大白鹅20000多只,销售额达百万,首次实现了盈利。村里的道路也修好了,兄弟俩买了辆二手货车,饲料可以直接运到养殖场,养殖场规模慢慢扩大。兄弟俩名气越来越大,村民杨勇在养鸭养鹅中屡遭失败后慕名而来,向两兄弟讨教养鹅技术,两兄弟也毫无保留的给他传授了养鹅技术。一年后杨勇学成返回村里办起了自己的养鹅场,他满脸幸福地说:“现在大概一年能养5000只鹅,一年利润大概有5、6万,一家人生活能够解决了,比在外打工好。回了家之后呢,我也传承了他俩兄弟的观念,不但自己学会了还要带动父老乡亲,他们来向我学习时我也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共同致富。”

到2011年,邓费建的养鹅场已有工作人员15名,其中教授1名,副教授2名,大学生6名,农民6



邓氏兄弟俩看着自己养的鹅会心一笑⁵

⁴ 图片来源:新闻资讯网创业天地创业案例“‘大学生猪倌’毕业回乡再创业”(http://dg.edutt.com/book_html/123110.shtml)。

⁵ 图片来源:华龙网今日重庆重庆专题“邓费建、邓波兄弟”(http://cq.cqnews.net/cqztlm/2012-08/10/content_18464305.htm)。

校友天地

名。鹅场占地 120 余亩,年产白鹅 2 万余只,无公害蔬菜 10 余吨。初具规模的饲养基地发展了数十家加盟户,带动地方经济增长近百万元。同时,邓家兄弟的农庄也为不少大学生开辟了一条就业之路。弟弟邓波的同学杨伟平毕业后,被招聘到养殖场担任业务负责人;目前还在学校就读的张郡,则利用周末等业余时间到养殖场勤工俭学。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决定将邓费建的养殖场确定为重庆市荣昌县第一个“大学生创业基地”,希望能够带动更多大学生自主创业。

谈到未来,兄弟俩充满了憧憬,扩大养殖规模,办屠宰场,建立从孵化到宰杀再到产品深加工的全产业链,而兄弟俩更大的希望是带领家乡父老共同致富。“我想自己走出一条创业路,在家乡的农民面前,树立起一个标杆,让他们相信,有了科学的养殖技术和知识,只要勤劳肯干,哪怕就是在交通闭塞、贫穷的农村地区,也可以通过发展养殖业脱贫致富。”邓费建说。

参考文献:

- [1] 朱芸峰,李桔梨.猪倌大学生变身“养鹅专业户”
[OL].<http://fd.cq.gov.cn/aspx/default/show.aspx?classid=75&id=64392>.

- [2] 咱们村的“鹅司令”[OL].<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8vGyqgw84Q/>.
- [3] 大学生毕业生回乡养鹅年产值已达 80 万元[OL].
<http://edu.people.com.cn/GB/8216/64308/67525/8591500.html>.
- [4] 邓费建、邓波兄弟 [OL].<http://xyb.swu.edu.cn/xyb/index.php?module=notice&id=87>.
- [5] 邓氏兄弟自立自强“感动重庆”[N].中国青年报,
2009-6-15.
- [6] 常青.大学生“猪倌”兄弟:行走农村奏响创业之歌
[J].山西农业,2007,(04).
- [7] 小兄弟俩养猪 [OL].<http://www.cctv.com/program/zfj/20071213/103516.shtml>.
- [8] 朱婉婷.邓费建、邓波:才下课堂,又上猪场的自强学子 [OL].http://news.cqu.edu.cn/news/info/article_200.html.
- [9] 郭小伟.邓家兄弟不寻常的求学路——一边读大学一边当“猪倌”[J].新闻三昧,2009,(04).

(责任编辑 刘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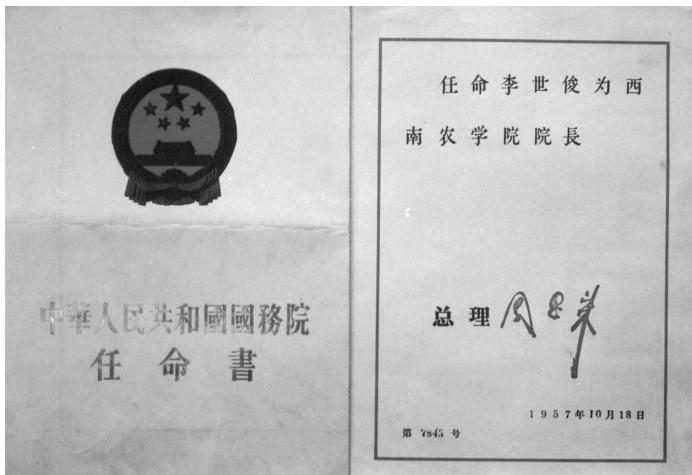
后记:创业的路是艰辛的,但邓费建、邓波兄弟俩在这条路上走的格外坚定。返乡创业不仅要靠激情,更要靠脚踏实地、开拓进取。他们用自己的实践告诉了广大青年朋友,农村同样是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广阔舞台。

西南农学院的首任院长—李世俊

□文/牟乔雅

编者按:李世俊,农学家,现代农垦事业的先驱者和实践家,在开辟南泥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制定农业政策措施等重大问题以及发展农业教育等方面有卓越的贡献。1957年10月任西南农学院院长,1962年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他吃苦耐劳、注重实干的精神是众口皆碑的。下面一组珍贵的照片记录了他艰苦奋斗,勤勉工作、与教职工同甘共苦的瞬间。

195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高等院校领导的指示,为加强农业部直属的八所高等农业院校的领导,李世俊被调往重庆任西南农学院院长,1962年任命为党委书记兼院长。在此期间,他还当选为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常委、四川省农学会理事、重庆市作物学会理事长。



周恩来签署的任命书¹



讨论工作²



走家串巷,了解群众的疾苦³

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29。

²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³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6。

影像记忆



参观技术革新成果⁴



全院师生员工举行盛大的向党报捷献礼大会⁵



深入田间地头⁶

李世俊任西南农学院院长期间，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他一直保持着延安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为了缓解粮食和饥荒的问题，他提倡多种瓜菜，并身体力行，常常扎进地垄田间，带头拾麦穗，收割庄稼等，和全校师生员工同甘共苦。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师生克服困难，度过了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

⁴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6。

⁵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

⁶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与师生一起参加生产劳动⁷



下田劳动⁸



⁷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⁸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

影像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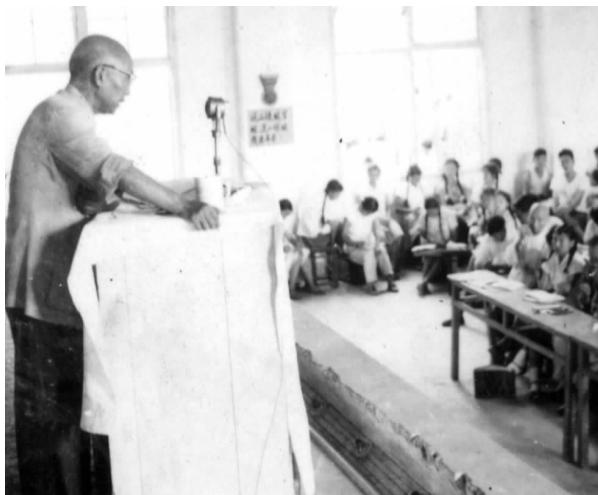
1960年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西南农学院在他领导下,积极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错误做法,压缩一些不够条件草率上马的专业,缩小办学规模。他还着力整顿实习农场,贯彻“多劳多得”原则,充分调动农场职工的积极性,大大减轻了教师和学生的劳动负担,保证了良好的教学秩序。



李世俊院长(前排左2)同教师 农场干部 工人在一起¹⁰



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教学实验农场的规划问题¹²



向全院师生作大力开展科学的研究的报告¹¹



李世俊一家¹³

1961年10月他被确诊患了肺癌,在住院治疗期间仍念念不忘工作,一直挂念着学院的教学、生产及全院师生员工的生活。1962年7月,在医院允许他回学院休息期间他仍带病坚持工作。1962年11月,李世俊不幸去世,年仅61岁。他对革命的卓越贡献及崇高品德永远留在了师生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 张晓华)

¹⁰ 图片由任昌福老师提供。

¹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¹²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6。

¹³ 图片由付显兰老师提供。

侯光炯还“债”

在众人眼里，侯光炯既有名誉又有地位，自然也不缺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富有的教授，却一生都在拼命还债。当然，这不是还经济上的债，而是还所谓的“欠人民的债”。

“欠人民的债”

侯光炯在科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很多很高的荣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面对一系列接踵而来的荣誉，侯光炯却很冷静，把自己应得的荣誉视为“欠人民的债”。他说：“名誉、地位和金钱都是人民给我的，我得到的越多，欠人民的债就越多。债是要还的，我这辈子，人民给我的太多了，只有拼上老命才还得清啊！”

为了还债，侯光炯用他的所有、他的智慧、他的一切来回报人民，把一生的心血、一生的岁月都献给了土壤，献给了农村。

夜以继日地工作

侯光炯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最浪费不起的就是时间了。”为了“向人民多还一点债”，他总是日夜以继地工作。

自从1973年在四川简阳蹲点以来，他除了出差、开会和回校上课，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在他的时间表上，从来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就连春节也是和农民一起过。他没有任何个人的休闲爱好，甚至到了连吃饭、洗澡、看病都觉得浪费时间的地步。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恨不得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到工作上，把每一分钟都掰成两半来用。他经常工作、学习到深夜十二点以后。在研究所里，

他每天晚上睡得最晚，早上却总是起得最早，不管冬夏，每天清晨都是他亲自拉响电铃，催促大家起床出操跑步；他几乎把每顿饭都变成了“工作餐”，总是边吃边跟大家谈工作上的事情，久而久之大家都成了习惯，如果有哪天不谈反而觉得缺少了什么似的。

尽管年事已高，身患多种慢性病，侯光炯却固执地拒绝进医院，实在不得已躺在了病床上，病床也立即变成了他的工作台。1995年，他因脊柱压缩性骨折，且伴有肺部炎症，在宜宾地委和学校领导的多次劝说下才在地区住了一个月的医院。在住院期间，他没有一天不是在病床上工作，即便身上在做着治疗，手不能动了，大脑都没有停下。在住院的一个月中，他不仅继续领导着免耕所的科研工作，而且还将长期以来一直盘桓于心，准备向中央建言的关于根治长江流域洪灾等重大问题的文字材料，进行了推敲和整理。一个月的时间一到，他就立即要求出院。大家劝他再住一段时间，他却无论如何也不通融，哪怕多一天也不愿意。地委方面赶紧向学校求援，希望学校的老师能劝说他在医院里再静养一段时间，但等学校的有关人员赶到时，老先生已由助手们用担架抬出医院，回到长宁了。

在侯光炯的带动下，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也从不计较工作的时间、假期和报酬。

不求索取 但求奉献

西南大学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封侯光炯写给学校工资改革委员会的“关于晋升工资的信”。这不是一封要求晋升工资的信，而是一封主动要求重新考虑自己一级教授薪级的信。

那是1956年，侯光炯被评为一级教授，工资也随之晋升。土壤农化系主任黄希素将这个情况告诉侯光炯，他听了不但不高兴，反而心情沉重，立即向

西大掌故

学校领导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于是便有了下面这封令无数人感动的信。

工资改革委员会列位同志：

顷阅黃希素主任交来土壤农化系工资改革草案,深感本人薪资标准,尚有可以商榷之处,愿提供考虑:

1.我最近两年来，出外时间较多，在执行教学计划方面远不如院内其他大部教师为严格，如今评为一等，自愧无以对同人。

2.本人在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已领工作费每月100元（实际上并未领取——作者注）。如今增薪成数及实际收入，再开我院最高记录，实感过分特殊。

兹谨建议您会，为我院工资改革效果着想，重新考虑本人薪级，不胜感盼。

此致

敬礼

侯光炯(印)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 北碚

侯光炯就是这样从不计较名利。他不仅从不向组织伸手，就连政策规定自己应得的收入也经常拒之门外。

20世纪50年代，侯光炯成为中科院生物地理学部常务委员，按规定每月有100元津贴，他坚决不接受。虽然他经济并不宽裕：一人的工资长期供养着十个人的生活；妻子常年卧病在床，子女众多，哥哥姐姐也需要资助，还要筹还新中国成立前向朋友们所借旧债。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自己节衣缩食，

侯光炯 1966—1976 年上缴党费情况¹

却想方设法地帮助别的同志。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对党内高薪人员提出降低工资的要求。他在全院第一个表态，要求大幅度降低自己的薪资，向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看齐。他说：“人民缺吃少穿，生活极度困难，我心里很难受，不能要农民供养我。我没为农民解决生产技术问题，我还叫什么专家啊？”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然受到审查和批斗，但每月领取工资后，只留下微薄的生活费，其余都交了党费，有时竟达200元之多，十年共计上缴党费17089.22元。

1989年,侯光炯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按规定提了两级工资。他每月除留下369元生活费外,余下的钱和所得稿费都用于设立“土壤青年科学奖励基金”。

1992年，四川省委、省政府重奖他10万元，他一分也不要，将它全部用于农业科普博物馆的建设和办免耕技术培训班。诸如此类的事数不胜数。

而他自己的生活却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他每月工资及各种补贴收入达 2000 多元，而他和炊事员每月生活开支仅 300 元。他身上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一双鞋子也是补了又补，多次发生坐火车卧铺、进大宾馆被服务员挡在外面的事情。他平时买只鸡、割点肉都要掂量了又掂量。有一次，炊事员感到老人成天吃素菜不行，瞒着他买了只鸭子回来，想给他改善一下伙食，老人知道后数落了炊事员好半天。对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他却总是慷慨解囊。几十年来，受到过候老救济、帮助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土壤生万物。它忠于职守，千万年来默默地为人类奉献出粮食和其他许多财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土壤这种没有喧闹、不求索取，但求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钦佩，时时启发我进行这样的思考：应该怎样对待工作、对待生命。

这就是侯光炯。

(张晓华根据余德庄《世纪情结——侯光炯的人生道路》整理)

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HGJ-SW1214-3.0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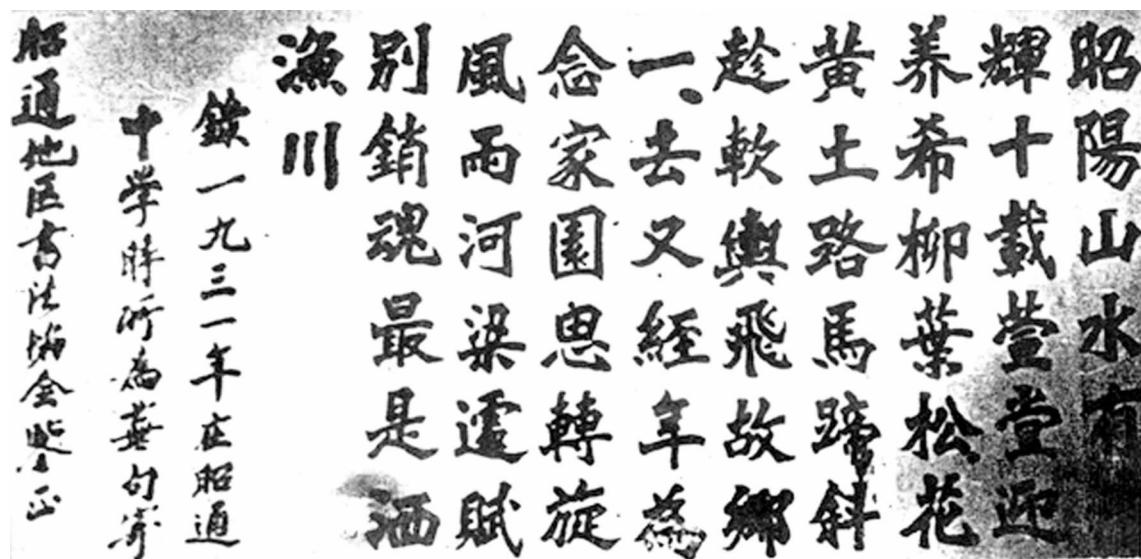
邓子琴灶口偷光

□文/邓力

20世纪60年代初，邓子琴教授率历史考察队先后到茂汶羌族自治县、凉山彝族地区、阿坝藏族自治州等地考察，为编写《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史》和开设四川少数民族史课程做准备。1960年的夏天，邓子琴教授来到巴塘，住在藏民家中。白天外出考察，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同考察队的年轻人一道，骑马跋山涉水，一天要走几十里，回到住地，已是筋疲力尽，但他还必须强打精神整理当天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撰写考察笔记。当时的巴塘，经济很落后，人民生活还很艰苦，没有电灯，甚至连煤油灯也很少见，晚上用松枝照明，幽幽晃晃高高地吊在屋子当中，光线极差。60多岁的老教授在松灯下整理资料，难免横撇竖捺搅和在一起。正在为此烦恼，忽见室内有个地方

光线很好。那是藏民做饭的火塘，宽宽的火塘口里，碗口粗的木柴正烧得噼啪响，火光从锅底映出，灶前一片明亮。邓子琴先生好是高兴，连忙招呼大家，快把凳椅搬到火塘边上。60多岁的老先生就这样借着灶口的光线整理起考察笔记来。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邓子琴完成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写出了《甘孜地区情况概述》《德格土司制度下的奴隶制》等论文和报告，出版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史要略》等著述，开设了4门少数民族历史课程。还在甘孜、阿坝两地搜集到历史文物600余件，其中20多件收入四川省博物馆。



邓子琴教授遗作¹

¹ 图片来源：<http://www.xldly.com/info/show.asp?id=164>。

蜀园的由来

□文/姚 恒

一座简朴却饱含校友情谊的小园子，依偎在散发着浓浓书香的西南大学北区图书馆旁，陪伴着莘莘学子安静地度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它，就是蜀园。

说它简朴，是因为此景区景物不多：浅浅花草，深深乔木，一座塑像，一块石碑，几张椅子……说它饱含校友情谊，是因为它是由“蜀”地的众多校友捐资修建。

那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时任四川省副省长的徐世群、四川日报社社长汪兴高、四川农工联合总公司总经理徐炜等倡议：以自愿捐款的方式为母校修建一个景点，以此来表达对母校的深情。这一倡议，首先得到了成都校友的响应，很快又扩展到绵阳、内江、宜宾、自贡等地，筹得捐款 12 万元。时逢母校筹备 50 周年校庆，学校征得校友们的同意，拟用捐款修建休读景点。这一景点建在何处？取什么名？学校就此事征求校友意见。校友们建议：景点为四川校友捐资修建，就叫“蜀园”；地点最好能够选在图书馆附近。

学校充分尊重校友们的意见，将未来的“蜀园”



蜀园中的孔子塑像¹

安排在图书馆逸夫楼左侧的坎下。

蜀园于 2000 年 7 月动工，9 月底竣工。2000 年 10 月 6 日，徐世群等校友从成都等地赶回母校，参加蜀园的落成仪式。由此仪式开始，西南师范大学正式拉开了建校 5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序幕。

蜀园园名由徐世群校友题写，由美术学院教授张启文先生设计制作。整个园区以高约 3 米的孔子塑像为视觉中心，周围辅以花卉乔木、健身小道和休闲长椅。园中孔子，目视前方，谦恭儒雅，流露出大师般的气质；塑像基座上面，由中文系教授曹廷华先生撰写的铭文，交代蜀园缘起，生发新意。铭文言简意赅，抄录如下：

大哉孔子，千古流芳。兴学垂教，文明衍昌。《春秋》昭明，《论语》辉煌。师表万世，日月同光。沧桑多所变，亘古一庙堂。孔圣风范在，师道永端庄。盛世重科教，当今崇学忙。母校华诞五十载，蜀中校友献热肠。捐资敬立素王像，慷慨师魂励同窗。诲人当不倦，学者宜自强。复兴巍巍中华，建好煌煌家邦；追先贤之懿范，期后学以显彰。孔林森森，学海泱泱，化德育才，地久天长。

曾经告诉校友，蜀园旁边那排低矮的平房将被拆除，修成大楼，新建的大楼将与图书馆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蜀园位在中央，一定会成为学校一个亮丽的景点。然而若干年过去，这里并没有如此的变化，蜀园带着些许寂寥静静地立在那儿，多少让人感到有些遗憾。不过，它作为师生休憩读书场所的功能想必已经达到。白天，这里有读书人；晚上，又是“日语角”……有学生的蜀园永远不会寂寞，蜀园的来历也因此会让人永远记住。

¹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X12-22。

高校校史研究的瓶颈及对策分析

□文/张晓华

校史研究就是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归纳和总结学校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资料，以探寻学校的发展规律，总结经验并吸取教训，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借鉴。中国自古就有盛世修史的传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史志的编纂工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史志编纂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校史研究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1984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一些高校纷纷成立校史编写组或类似机构，组织力量进行校史的编撰工作，逐渐形成了修史、编志的优良传统，开创了学校校史研究工作的新起点。经过20余年的积累和发展，大学校史研究取得了不少喜人的成果，许多高校已编辑出版了多部校史著作及校史资料，研究队伍逐步稳定化，研究内容逐步专门化并逐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逐步多元化，近年来还涌现出一批专业有专攻的年轻研究者，为校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作为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文化基础事业，校史研究工作已成为许多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一项系统工程，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在保存和见证学校的发展历史、丰富校园文化、教化育人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校史研究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制约着校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一、校史研究的瓶颈

1. 资料问题。校史资料的丰富程度影响着校史研究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拥有全面而丰富的资料是校史研究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目前许多高校现有的校史资料存在着结构性缺陷：一方面由于原

来国家和学校对档案工作不重视，早期资料特别是解放前的资料严重匮乏，使学校早期历史的研究无法深入；而改革开放后的资料特别多，又面临着大量信息取舍的问题；另一方面，校史资料主要是文字资料，图像、音响、器物类的资料比较少，载体形式的单一不利于校史研究成果的推广和传播。

2. 机制问题。校史尽管重要，但大多数高校既没有设立相应的科研项目，也没有开设校史课程，而且很少有人去专门研究校史，更谈不上形成一种长效机制，只有临近学校较为隆重的校庆时，才会有人想到校史问题，临时组织力量急功近利地进行突击。这样的校史研究水平难以保证，更不可能健康地发展。一些高校虽然设有校史办公室，但性质还是行政机构，并非科研机构。

3. 创新问题。目前，虽然少数高校校史研究发展较快，水平也较高，但总体来说，我国的校史研究工作还处于较低发展层面。各校的校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校史的编写、庆典时的宣传等基础性研究和现实功用方面，校史论著大多千篇一律，普遍存在研究方法单一、写法雷同、缺乏新颖性、可读性差、共性多而个性少、对史料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东西挖掘和提炼深度不够等问题，教授学者无论任教时间长短、学术贡献大小，都平均用力，并且多为表扬稿似的简略描述，并没有体现出他们的精神风骨及其学术地位，也没有挖掘、提炼、展示出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东西，更没有体现出本校的办学特色和理念。在校史研究成果推广方面也存在推广途径单一、推广范围狭窄的问题，没有充分发挥自身“存史、资政、育人、宣传”的作用。

由于存在上述缺陷，校史研究工作往往被边缘化，得不到学校领导和师生的广泛认可，行政资源与财力资源也得不到保障，校史研究因缺乏可持续发

展的深层动力而无法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

二、突破瓶颈,促进校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1.做好资料收集工作。资料是校史研究工作得以开展的基本条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只有占有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全的资料,校史研究才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学校的办学史、教育史等脉络才能得到更好的梳理和总结。一方面,校史研究者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料,深入地挖掘和提炼;另一方面,校史研究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注意多途径地收集和发掘新的资料和实物。既要利用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网络收集各种资料,也要通过个别访谈、集体座谈、问卷调查、实地观察等途径去收集资料;既要收集有形的资料如档案文献资料、校园器物、校园建筑等,也要收集无形的资料,如口述与音像资料等。另外还要注意史料文物的征集和抢救工作,对于那些阅历丰富、德高望重而又年老体弱的校领导、知名教授和杰出校友,要只争朝夕地做好口述史料的抢救工作。另外,资料收集后,还要用史料考证法、二重证据法等方法辨别资料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估量资料的价值与用处,对所得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并按照校史研究的要求对资料进行分类、编目、立卷归档,为校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健全校史研究机制。学校在校史机构建设、制度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必须与时俱进,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才能促进学校校史研究的科学发展。校史研究是一项学术性工作,需要一定的科研保证和行政保证才能有效实施。因此,既要把校史研究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作为正式科研课题来操作,为高校校史研究提供经费保障的正规渠道,确保此项工作的专门化、规范化、长期化;又要把校史研究放在有一定的行政话语权、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职能部门,探索长期而稳定的校史资源开发机制,保证人力、物力持续投入。有了行政层面与科研层面的双重保证,校史研究还必须要有人力保障。校史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建立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为此,高校应通过增加编制、设立岗位、明确待遇等措施,建立起

一支数量充足、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思想稳定、新老结合的专职队伍。同时,还可以由熟悉学校历史的党政领导直接牵头,聘请一些兼职的老领导、老同志组成顾问团,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一支包括专职人员、教育家、史学家、校史研究爱好者等不同研究优势人员组成的专兼职结合、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以增强校史研究工作的生机与活力,从而提高编研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3.拓宽视野。高校的发展史归根到底是教育的发展史。因此校史研究应该在教育史的理论方法指导下,在史学与教育学的结合处开展研究,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具体来讲,在理论方法体系上,校史研究应该拓宽研究视野,有选择、有创造地运用史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实践中构建出校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体系;在研究内容上,校史研究也应该拓宽研究视野,不仅要重视“正史”的研究,还要重视“野史”的研究。“野史”往往更能“复原”历史上的校园生活,更能展现一校的治学传统和人文精神,更具有新颖性和可读性,其影响不见得比“正史”小。

4.与教学、科研工作相结合。教学、科研工作始终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校史研究作为学校辅助性的工作,只有为教学、科研工作服务才会有生命力。如果校史研究只是编写一些体例单一、文字空泛、远离学校实际需要、缺乏新颖性和可读性的志书类文字,必然不能得到师生的广泛认可,更不能达到陶冶情操、升华思想境界的目的,其服务功能也就无从实现。校史研究应结合学校的中心工作,充分利用信息资源优势,因时因事选择最佳研究课题,运用严谨科学的方法,开展学科建设史、院系史、科技史、社团史、经济史、思想史、人物史等专项研究,重点挖掘学校的重大事件、挖掘学校的代表人物、挖掘学校的办学传统、历史使命和精神,提炼出学校办学的优良传统以及一代代师生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某种“精神”和“理想”,体现出学校的人文素养与人文精神,突出学校的学风和个性,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启人新知,为学校中心工作服务,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同时,校史研究者应紧密结合形势,利用收集到的文字、音响、声像、实物等丰富多彩的资料,通过举办专题展览、召开座谈会、开设讲座、开办宣传栏等形式来宣

传学校的悠久历史文化、弘扬爱校荣校精神，在构建和谐校园、建设校园文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具体说来，可适时举办主题鲜明的庆祝活动，展现今昔风采，抒发炽热情怀，鼓励在校学生奋发向上，感染毕业学子反哺施恩；可开设校史课程、成立校史宣讲团，向各届学生宣传学校的历史、传递校史信息，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可在利用校园电视广播、校园网站、校刊校报等媒体，追溯学校历史名人，歌颂其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奋斗不息的精神，引导大学生见贤思齐，以他们为榜样，正确地规划人生；等等。

5.加强交流与合作。校史资源是我国所有高校的共有资源，各高校要加强与其他院校的沟通与交流，整合各自的研究力量，实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校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各高校要做到在校史研究上共享校史素材，发挥各自优势，联合申报项目，在理论方法和研究思想上加强切磋和探讨，在研究工作上互相借鉴，在研究成果上互为补充，为提高高校校史研究的整体水平而共同努力。

总之，在校史研究方面，要紧密结合学校的发展，按照“突出重点，做出亮点”的思路，不断扩大校

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高校史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做到“观念有创新，工作有实效，成果有标志”，打造一批文化精品，在校史研发工作中走出一条新路。

参考文献：

- [1] 周良书. 大学校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6 年 7 月第 13 卷第 4 期: 56—62.
 - [2] 杨洪勋, 孙厚娟, 蒋秀丽. 高校档案部门联合进行校史研究的探讨[J]. 山东档案, 2004 年第 2 期: 1—5.
 - [3] 陈均. 高校校史研究发展方向探讨[J]. 兰台世界, 2007.12 下半月: 20—21.
 - [4] 汪洪亮. 略论大学校史研究与编纂[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年 9 月第 32 卷第 5 期: 121—125.
 - [5] 王钰慧. 论高校校史研究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J]. 兰台世界, 2011 10 月中旬: 55—56.

(责任编辑 刘润)

(上接第 10 页)

我是中国人还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事

我们都知道何先生留美成绩优秀，而且在美国任过教，为了祖国的建设事业，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回到国内。就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他还时不时收到美国友人的来信。有一次我碰见他刚看完一封英文信件，他对我说：“又是要我去美国工作，这怎么行呢？……”，我大胆的问：“何先生你说美国好不好？”他说：“各有各自优点，但是我是中国人，还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事。”

我能为国家效力到八十岁

何先生很平易近人，我们接触多了，自然也比较

随便。有一次我和陈思勇谈论比较身体，刚好何先生在场，我们顺势一看何先生身体很强健，于是都夸赞何先生身体好，他一听非常高兴地拍拍手臂说：“嘿！你们不知道我在学生时期，就是校足球队队员，凭我现在的身体，为国家效力到八十多岁也没问题。”真没想到几年后一场劫难，就夺去了他的生命，未能实现他的心愿。

我想从上面我所依稀记得的一些片断中，可以看出何先生的人品。虽然他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热爱祖国，一心为民，爱生如子的精神，求是严谨的科研和教学作风，是值得我们一生学习效法的。

(责任编辑 杨程程)



走进红色南昌

——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文/李天兰

八一南昌起义，简称南昌起义或八一起义，是1927年8月1日，在中国江西省南昌市，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此次起义主要由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贺龙等人领导，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8月1日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中山路西端洗马池，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贺龙指挥部旧址、叶挺指挥部旧址、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朱德旧居5处。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是原江西大旅行社，当时的江西大旅社设有茶楼酒馆，是二十年代南昌城内首屈一指的豪华大旅馆。由于地处闹市区，来往人员复杂，因此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非常隐蔽。大旅社采用中西合璧的风格，外观以具有西洋风格的水泥浮雕装饰门窗，楼内有一宽大的天井，天井里放有四口防火用的大水缸，显示出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格局。整栋楼房是一座“回”字形中西合璧砖泥建筑，是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1927年7月贺龙部队二十军进驻南昌后，其第一师将江西大旅社整个包租下来，把师部设在这里。其中的喜庆堂，原是给有钱

人做寿、办喜事用的地方，起义指挥部临时把它作为会议室，多次在此召开重要会议，研究和部署起义的有关问题。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创建于1956年，是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首批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多年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致力于馆藏文物的征集和研究，不断丰富馆藏文物，同时对总指挥部旧址进行了维修和翻新，对现有陈列进行了更新、改进。纪念馆还运用高科技手段，采用声、光、电同步进行的大型沙盘模型，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南昌起义的战斗过程；运用多媒体影视合成影像，采用电动图表、绘画等现代化手段，丰富了整个大厅的陈列内容。新的陈列和复原陈列相结合，使纪念馆更富有生动性和教育性。

南昌起义是一次伟大的武装起义，没有这次起义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缅怀革命烈士、增强爱国之情的平台。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笔为该馆题词“军旗升起的地方”。纪念馆内现供参观的有：会议大厅即原“喜庆厅”、周恩来工作和休息室、林伯渠办公室及卧室、军事参谋团办公室、第二十军第一师警卫连及卫生处住房等。旧址门首悬挂着陈毅手书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鎏金横匾，大楼的二、三层，已辟为四个陈列室和一个题词纪念室，陈列着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图表、照片、文物以



八一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自左向右)刘伯承、叶挺、周恩来、贺龙、朱德群雕¹

及参加南昌起义的老同志题词，生动地再现了南昌起义的光辉历史篇章。纪念馆展出面积达 1500 平方米，展线长 350 米，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馆藏文物 2600 余件，藏有具历史价值的人物照片 280 多张，文物资料 60 多件。

贺龙指挥部旧址

贺龙指挥部旧址系南昌起义旧址群之一，坐落在南昌市子固路 165 号。1961 年，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贺龙指挥部旧址原为中华圣公会宏道堂，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古建筑。1927 年 7 月下旬，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进驻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军指挥部就设在宏道堂。部分起义领导人住在宏道堂后小楼寓所，并在此举行过多次策划起义行动的重要会议。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贺龙、刘伯承、周逸群在此指挥了武装起义。大楼前三楼窗口仍留有当年敌方炮弹弹痕，为起义时激战景况的实录。旧址小楼复原了贺龙等起义领导人的办公室兼卧室，军指挥部会议室、办公室、会客室，并陈设了大批珍贵实物，还设有《贺龙元帅生平展》，展示了贺龙元帅光辉战斗的一生。



贺龙指挥部旧址²

¹ 图片来源：<http://xiangce.baidu.com/picture/detail/0e628e0de300a41f1df9ba34d04f12c233e763b4>。

² 图片来源：http://www.nc.gov.cn/ljnc/rwys/wbdw/qgzdwbbhdw/200809/t20080925_107894.htm。

叶挺指挥部旧址

叶挺指挥部旧址位于南昌市百花洲东湖旁的第二中学内，为砖瓦结构工字形二层楼房，原是南昌心远中学校舍的一部分，面积 907.20 平方米。南昌起义时，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指挥部就在这里。楼上为办公室、会议室和电话机房，楼下是军指挥部警卫部队驻地。1927 年 7 月 30 日下午二时，叶挺在此召开了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营以上及师直机关的军官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部署了战斗任务。叶挺旧居原在南昌二中教学大楼前面，但于 1958 年拆除。



叶挺指挥部旧址³

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

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位于南昌市八一大道 376 号，在清末曾是训练清军的场所，后改为江西陆军“讲武堂”。旧址范围包括今南昌警备区及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占地面积 2674.24 平方米，是一个座北朝南的庭院，院内全是砖木结构的一层平房，房屋平面大致呈“匱”字布局，包括朱德的办公室，教育团会议室，教职员办公室、宿舍以及传达班、通讯班的住房。旧址内陈列展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朱德军官教育团革命活动图片展；朱德军官教育团复原陈列以及朱德同志生平图片展。这些展区以大量照片、图表等形式介绍了朱德创办军官教育团在南昌和江西省各地开展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参加南昌

起义的情况。

1926 年，朱德赴德留学回国后任南昌公安局长，遵照党的指示，利用自己以前在滇军护国军内的威望和同僚关系，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从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学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的领导，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教育长，曾天宇任教员。1926 年底，学校开始接收学员，到 1927 年 2 月，接收学员 1000 余人，成为南昌革命活动的一个基地和堡垒。1927 年 8 月 1 日，在朱德领导下军官教育团部分学员参加南昌起义，并随朱德南下广东。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大部分建筑被毁，未毁建筑经过维修基本保持原貌。解放后，这里是人民解放军军事用房。1961 年 3 月 4 日，中国国务院公布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7 年筹备纪念建军 50 周年活动期间，江西省委、省革委下文将该处房屋交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布置陈列，并负责管理。1982 年文化部批复同意朱德军官教育团为南昌起义指挥部旧址之一。

朱德旧居

朱德旧居位于南昌市花园角 2 号，这是一所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坐西朝东，雕花飞檐悬于门楣，两扇大门，内有天井，是典型的江南民居。1926 年 12 月，朱德受党的指示来到南昌，包租了花园角 2 号，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创办了军官教育团，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参议兼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南昌警备司令、公安局长。在此期间，朱德为保护和发展革命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7 年 7 月下旬，周恩来从武汉来到南昌肩负起组织和领导起义的重任，从第一天起，他就住在这所住宅的厅堂里。旧居的一楼北侧是朱德的卧室，南、北前房及正房是警卫员的住房。二楼北侧是郭沫若的住房，他曾在此写下《请看今日蒋介石》。现已按原貌恢复了朱德卧室及周恩来住过的厅堂。

(责任编辑 刘 润)

³ 图片来源：hsly.hlhtrip.com/html/2009-7/9/9959224343.htm。